

侯俊智 刘佳 编著

书山有路

风采 书山有路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新华出版社



侯俊智
刘佳
编著

风采

书山有路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山有路/侯俊智, 刘佳编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11

(毛泽东风采)

ISBN 7 - 5011 - 6403 - 7

I. 书… II. ①侯…②刘… III. 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853 号

书 山 有 路

侯俊智 刘佳 编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12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11 - 6403 - 7/A·14 定价: 16.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 65895562 65897685

前言

内江杂

风采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具有十分独特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在他逝世后的近 30 年间，仍有无数的人们怀念他和他的时代。

在毛泽东独特的人格魅力中，他那孜孜以求、博览群书的勤奋精神留给人们很深的印象。毛泽东不是出生于书香门第，他对于书的热爱完全是出于对社会、对人生、对真理的思考的需要。因此，他不属于作书斋的学究，而是把自己的读书生活紧紧地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而他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他十分善于从众多的书籍中汲取古今中

外的精神营养的结果。至于他在诗词、政论文章、哲学方面的成就，乃至工作作风、语言风格，更是直接得益于他的博览和广学。读书，占据了毛泽东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位置。

让我们寻着毛泽东走过的一生，回顾一下这位伟人是如何在不倦的读书中，探寻真理，追求光明的吧。

毛泽东
风采

目录

前言 /1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 /1

勤奋的私塾生 /2

从东山高小到湖南省立图书馆 /9

《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批注 /13

两次北京之行 /23

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 /28

戎马倥偬，读书不辍

——毛泽东革命战争时期的读书生活 /33

艰难岁月的寻觅 /35

延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38

“作工具的研究” /51

“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64

目录

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书 /72

从《水浒》、《三国演义》中学习军事知识 /82

菊香与书香

——毛泽东建国后的读书生活 /87

研读“正史” /89

“稗官野史也要读” /105

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古典文学 /113

反复阅读 艰辛探索 /161

读英语书籍 /171

对自然科学的关注 /175

主要参考书目 /189

寻求 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

毛泽东
风采

毛泽东成长在具有独特学风的湖南乡村，从小就对书籍和祖国的传统文化抱有极浓厚的兴趣。他后来由一位农家子弟成长为中国最早信奉共产主义的先进青年之一，在这其间的思想几经变迁。这些都十分突出地印记在他这一时期读书生活的每个阶段。

勤奋的私塾生

毛泽东是在 1902 年他 8 岁那年，开始进私塾读书的。当父亲带着他在韶山南岸私塾里躬身向写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子下拜时，从此他的一生就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私塾，像当年许多受业学子一样，毛泽东也从《三字经》开始读起，继而又读了《论语》、《孟子》和《诗经》。从一开始，毛泽东就表现出很强的悟解

力。他读这些书从不出声。有一次，私塾老师邹春培先生以为他看不懂，要给他点书。毛泽东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邹先生说：“你特来读书，我不给你点书你如何能懂？”毛泽东回答：“你不要点，我都背得。”原来他已开始学会翻看《康熙字典》进行自学了。由于他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劳神，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论语》和《诗经》。

1906年，毛泽东转学到韶山井湾里私塾，直到1907年—1908年间父亲要他辍学为止。在私塾老师指

毛泽东
风采

导下，他阅读了《春秋公羊传》、《左传》等经史书籍，但有着强烈求知欲的少年毛泽东开始不满足于这些沉闷的书籍，他迷上了被视为“杂书”的《水浒传》、《精忠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由于课堂上不允许看这些书，毛泽东就在这些书上面放上一本“正经书”，以掩塾师的耳目。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许多故事，我几乎都可以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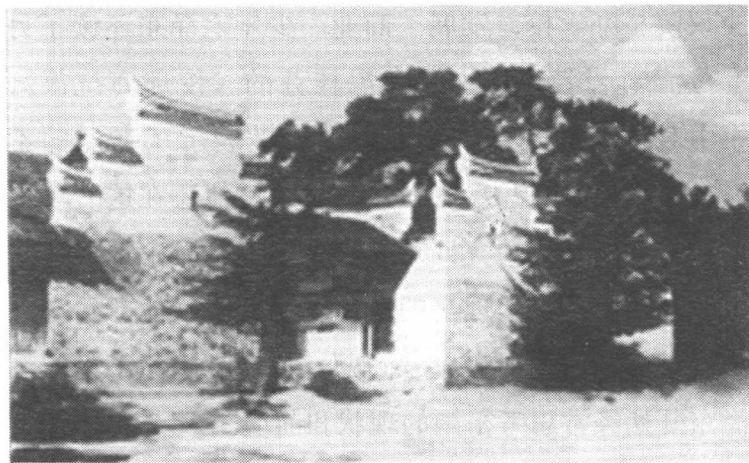
辍学以后的少年毛泽东，白天和成年人一起到田间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然而，只要一有空闲，他仍然如饥似渴地读书。凡是韶山地区能借到的书他几乎都阅读了，有时还跑到几十里远的舅舅和表兄弟那里借书。

难能可贵的是，少年毛泽东善于在读一些旧小说时进行独立思考。有一次，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种田的农民做主人公。在以后整整两年的时间里，他问过许多人，都没有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人们

毛泽东

风采

以为这是一个怪问题。后来，少年毛泽东自己找到了答案。小说中的帝王将相，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而农民则终年辛勤劳动，生活艰苦，不读书、不识字，更不会写书了。写书的人一定不是农民，他们不了解农民，看不起农民，当然不会写、也写不出关于农民的书来。他深深地为同自己朝夕相处的农民抱不平。他常常对小朋友们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后来，他真的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一部农民翻身当家做主的时代之书。



毛泽东8岁发蒙读书，到13岁在韶山先后就读过6所私塾。他白天在私塾里读书，清早和晚上在田里干活。图为毛泽东发蒙的韶山南岸私塾旧址。

毛泽东
风采

在对旧书的不满中，少年毛泽东也开始接触到了
一些具有中国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书籍。他从表兄文
运昌那里借到了一部《盛世危言》。油灯下，他读之
再三。这是一部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中具有
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改良
主义思潮的全貌。作者郑观应，曾游历西方。他在书
中认为中国贫弱之缘，就在于缺少西洋的机器工业，
所以中国应修铁路、造轮船、设电话和电报等。他还
批评当时顽固派的保守，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
立议院，办学校，发展工商业。少年毛泽东还读了另
一位清末著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
书中对外国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强烈的不
满，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他还在这时读了
明末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毛泽东觉得这些
书较之四书五经，现实的多，有用的多。他开始意识
到读书应当结合现实思考问题。从这时起，年轻的毛
泽东开始经常思考祖国的现状和前途。

1909年，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少年毛泽东又产生
了恢复学业的愿望，他的父亲被迫作了让步。于是，
毛泽东复学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先是受业于
政法学堂毕业的塾师毛岱钟，后又在曾供职于蔡锷部

毛泽东
风采

下的毛麓钟的门下学习。他先后读了《史记》、《汉书》、《通鉴类纂》等许多史书，以及一些时论和新书。



毛泽东
风采

1907年至1909年秋，毛泽东按照父亲的意旨辍学在家，白天同成人在田间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账。为不使父亲看到灯光，他常在晚上把卧室门窗遮起来，读书至深夜。这期间，他阅读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书籍，其中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使毛泽东萌发了爱国思想，并激起强烈的复学愿望。

当毛泽东眼界渐开时，整个中国正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1910年，湖南爆发了饥民暴动事件，韶山也发生了穷人“吃大户”运动。毛泽东的父亲也受到了冲击，他的粮食被当地的哥老会抢去。

接连发生的事件，促使求学中的毛泽东作进一步的思考，也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为寻求答案，毛泽东更拼命地读书。这时，他读到了一本叫做《列强瓜分之危害》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首页开头一句赫然写到：“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句话对毛泽东震动很大，印象之深，以至20年后，他仍记忆犹新。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宗主权的丧失和中国所面临的威胁。这种深刻的危机，激发了少年毛泽东强烈的爱国心，他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这对毛泽东思想上的迅速成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就在这时，父亲要把他送到当时湘潭县的一家米店当学徒，然而已被知识和新思想深深吸引住了的毛泽东根本无法接受这一安排。当他从表兄那里得知湘乡县有一所新式学堂时，就毅然提出要到那里去求学，并想办法说服了父亲。他将第一次离开家乡韶山冲，前往25公里外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求学。临

行前，他留给父亲一首改自于日本人西乡隆盛的短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原诗为：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从东山高小到湖南省立图书馆

在东山高小，毛泽东第一次受到了新式的学校教育，学习了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英语，而这些是在旧式私塾中根本无法学到的。

这一时期，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另外，他从表兄那里借得一套《新民丛报》，这是梁启超 1902 年在日本横滨创办的一份维新派报纸。这些报刊和文章，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的广泛宣传和介绍，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使毛泽东觉得无比新鲜，从而一度使毛泽东十分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接受了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阅读了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圣贤，如有关尧、舜、秦始皇、汉武帝事迹的书。他还从同学萧三手中借到了一部介绍外国名人的书《世界英雄豪杰传》。当他把书还给萧三时，很抱歉地

毛泽东
风采

对萧三说：“对不起，我把书弄脏了。”原来，他在书上用毛笔加了许多圈点，其中圈点最密的是关于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他还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这些中外杰出人物的事迹中受到启发，少年毛泽东树立起了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伟大理想。

在东山高小就学半年之后，毛泽东带着更为远大的志向，前往省会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那是1911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而长沙当时是湖南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晚清几十年中新旧斗争的激烈场所。毛泽东置身于这个环境，很快就感受到了一股革命的气息。他在刻苦读书的同时，广泛阅读各种报刊，留心观察社会。这时，他第一次读到了由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他被这份报纸中的激烈反清言论所吸引，迅速转变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在这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长沙的毛泽东积极响应湖南革命党的号召，成为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团）第一营左队的

一名列兵。此时，他仍不忘读报，他拿扣掉伙食费后所剩无几的军饷去订报。有一天，毛泽东从《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那只是江亢虎等人宣传的社会改良主义。1912年春，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结束，于是就退出了新军，又回到了读书求学的轨道上来。经过多次选择之后，毛泽东考取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第一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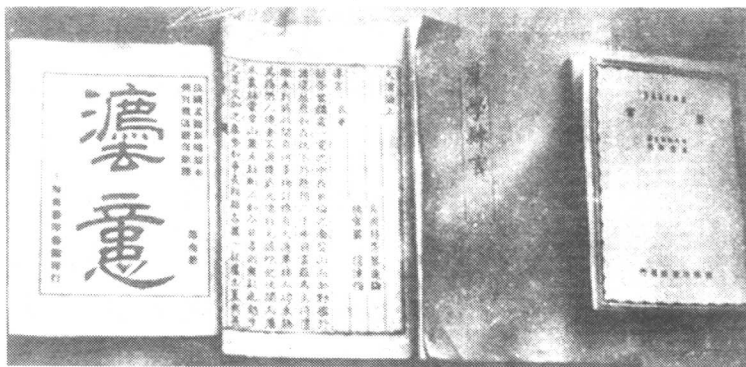
进入这所学校后不久，毛泽东发现这里课程有限，校规烦琐，感到十分不习惯。强烈的求知欲和迅速成熟的思想，已使青年毛泽东无法适应这种循规蹈矩的教学方式。这时，有一位国文教员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是一部上自远古、下至明代，共116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书。青年毛泽东对这部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产生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同时他觉得由课堂读书转为自学，也许对研究学问有更大帮助。这样，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了半年之后，毛泽东就主动退学了。1912年的下半年，他到位于长沙东南的定王台下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并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他经常是第一个走进门，借了书，就伏案阅读。中午买两块糕饼作午餐。

毛泽东

风采

他拼命地阅读着书籍直到闭馆。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读书生活时，曾风趣地说：“那时，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

毛泽东在这个图书馆，阅读了大量书籍，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穆勒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与此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许多诗歌、小说。这些书使毛泽东的认识和分析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思想境界也有了新的飞跃，他开始摆脱中国旧学的樊篱，跟上时代的潮流，成为那个时代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



图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期间读过的部分西方名著。

青年毛泽东还在省立图书馆第一次“认识了”世界。当时在图书馆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輿图》，毛泽东每天经过，总要停下来细看一阵。在此之前，毛泽东看过中国地图，但看了这张世界地图后，他才真正知道了脚下的地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后来他说：“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称居四海之内，把自己和整个世界等同起来，当然大的了不得。其实从地图上看，它只占世界的很小一部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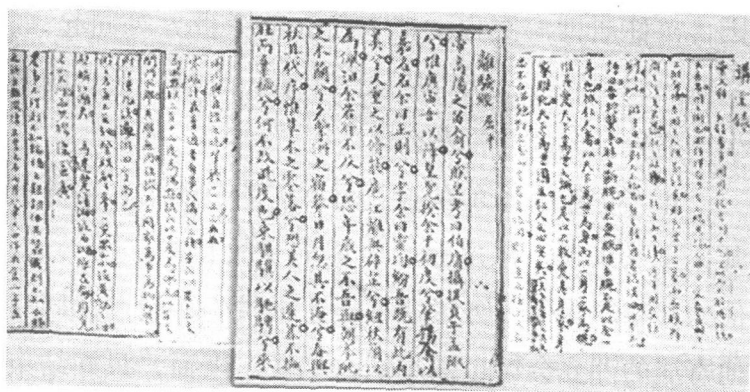
正当青年毛泽东在省立图书馆博览群书，眼界大开，学习兴趣正浓之际，生活的变故打断了这一切。他的父亲以为他不务正业，停止提供生活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军队占用了。因而，只好结束了他自认为“极有价值”的半年读书生活。

《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批注

1913年3月，毛泽东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春天，这所学校并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这样，从1913年春天到1918年夏季，毛泽东在这所当年很有名气的学校学习了五年半。这一时期成为他思想全面成熟的重要阶段。

毛泽东
风采

在这一时期的前期，青年毛泽东在课堂上比较致力于国文、修身、历史和地理的学习。我们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所写的一本笔记和一本书的批语中，可以窥见青年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和他从中所受到的影响，以及他的好学深思的情况。



在众多学科里，毛泽东非常喜欢哲学、史地、文学等学科。这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和手抄的《离骚》。

这册笔记共 47 页。前 11 页手抄的是屈原的《离骚》和《九歌》，这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细读楚辞的见证。后 36 页冠以《讲堂录》之名，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课的听课笔记和一些读书札记。在《讲堂录》中提到的书籍有：《论语》、《孟子》、《庄子》、

《荀子》、《管子》、《老子》、《诗经》、《礼记》、《易经》、《孙子》、《左传》、《尚书》、《列子》、《史记》、《汉书》、《晋书》、皇甫谧《帝王世纪》、《吴越春秋》、《农书》、《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杜祐《通典》、苏洵《嘉祐集》、《苏轼诗经》、司马光《资治通鉴》、《朱子文集》、《河南程氏遗书》、《张载集》、《陆九渊集》、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姚鼐《惜抱轩文集》、牛运震《空心堂文集》、吴佛业《梅村家藏稿》、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读通鉴论》、魏际瑞《魏伯子文集》、潘耒《朴学斋稿序》、《红楼梦》、《曾文正公全集》、《郭嵩焘日记》、《圣经》，以及梁启超、杨昌济的文章。这些书，毛泽东不一定本本通读过，较多的是讲课老师所述。但在极为缺少有关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材料的情况下，这册《讲堂录》至少可以反映出当年毛泽东读书涉猎之广，用功之勤，由此还可以窥见当年他所受的影响。

在当时的诸多教师中，毛泽东受杨昌济的影响最深。杨昌济是从日本和英国留学回来的留学生，教授伦理学。他信仰进化论的唯心主义，但他追求新思想和提倡躬行实践的精神，给当时受教的学生以积极的影响。他在教授伦理学时，引中国儒家文化入内，奉孔孟程朱为正宗，对清王朝的曾国藩尤为称道。在杨

毛泽东
风采

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曾细心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类》、《小学》、《四书集注》等书。在《讲堂录》中就抄录了朱熹的大量言论，他写道：“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不得矣。”赞同朱子的“格物致知说”。同时，他还十分赞同朱熹的知行观，《讲堂录》中的“古者为学，重在行事”、“实意做事，真心求学”等语，表达了他与朱熹“行重知轻”相一致的观点。

《讲堂录》中较为集中地抄录评论的有曾国藩的言论，可见，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赞赏，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这一点正是深受杨昌济的影响的。当今的历史书中主要记述的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罪行，而掩盖了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名声。其实，曾国藩是个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刻影响的人物，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当年毛泽东曾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其中，他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现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还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扉页均有毛泽东手书“咏芒珍藏”。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

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也。”可见对曾国藩推崇之高。



曾国藩是清末湘军首领，著作有《曾文正公全集》。早年也曾就读于岳麓书院。他兼重义理与实学的作风，对湖南人物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青年毛泽东珍藏的曾国藩家书。

《讲堂录》中还多次提到并抄录《韩昌黎全集》中的许多文句。在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前，毛泽东有一段时间十分喜爱梁启超笔带感情的文体，并有心效仿。而当时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却不佩服梁启超的文章，认为梁文半通不通，他主张毛泽东改变文风，攻韩愈体。毛泽东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后来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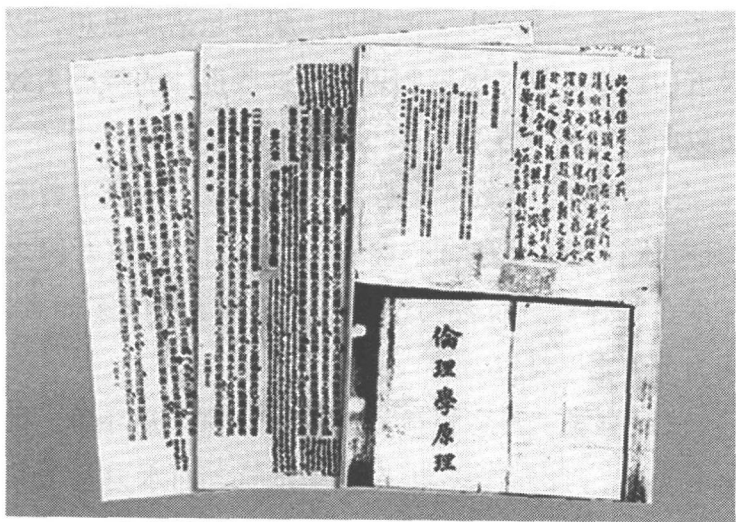
毛泽东
风采

泽东回忆说：“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在毛泽东以后的文章中，往往可以在句法、结构、格局和思想方面等等，看到韩愈对其的影响。

从《讲堂录》中可以大致看出青年毛泽东读书之博，用功之勤。尤为重要的是，他听课读书，从不究心于奇闻怪事，也不屑于细琐的考据，而是用心研究心、物、治、乱、圣贤、修身、治国等经世致用的大道理，这是树立远大的人生观初期所做的严肃思考。在求学之道方面，青年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课余，毛泽东就去图书馆。他在那里曾仔细阅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另外，根据自己的兴趣，毛泽东还向老师和同学大量借书。现存有不少他当年向同学借书的书信。1915年冬致萧子升信说：“思借《君宪救国论》一阅，见处既无此，以后随意觅见之可也。”1916年2月致萧子升信又说：“《甲寅》杂志第11第12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一次毛泽东向萧子升提出要借一大批古籍，看到他如此爱读这些书，萧子升就要把这批书赠给毛泽东。次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去，开列了以下书目：“右经之

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他认为还是以借为宜。毛泽东还曾十分勤奋地手抄借来的书，一来可以细读此书，二来可以留作备读。1917年9月26日，他的同学罗学瓚在日记中写道：“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有关伦理学的书就抄了七本，可见毛泽东抄书之勤。



这是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注，读书约10万字，毛泽东写了12000余字的批语，阐述对原著的见解，用他后来的话说，他“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
风采

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当年毛泽东的一本《〈伦理学原理〉批注本》。《伦理学原理》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由蔡元培译成中文。杨昌济在湖南一师讲授伦理学课时，选中了这本书作教材。毛泽东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上“修身”课时读了这部书。在这部书的空白处，青年毛泽东用工整的小楷写下了大量的批注，最多的一条达5900余字。这些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他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和引申。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墨子、孟子、朱熹、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期的国事和思潮。这些批注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一、重视个人价值，强调个性解放。批语中曾有“凡有压抑之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二、强调“善恶相竞”，对立统一和矛盾斗争。批语中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又说“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

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三、极端重视思想和知识的作用，追求变革旧传统的新思想、新观点。批语中说：“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没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

四、重实践，重道德。批语中说：“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道德之实行，因赖感情与意志，而其前必于此将实行之道德，有明判然之意识，而后其行为乃为自动的。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又说：“道德哲学在开放时代尤。”

五、在这些批语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泡氏的进化论观点以及谭嗣同《新青年》等所倡导的进步学说中得到启发，在思想上已具有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批语中说：“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

从这些批语中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在哲学思想的杂学庞收，以致解放后毛泽东看到这本书时说：“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这本书的

毛泽东
风采

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批注本》是反映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的两部重要文献。尽管这两部文献只反映了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的一部分，但大致体现了他当年的读书倾向和思想状况，以及勤作笔记，勤于批注，勤于思索和认真严肃的学习方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追求真理，改革社会 and 好学深思的精神。正如当年毛泽东写过的一副对联所言：“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这正是青年毛泽东刻苦攻读、勤奋好学、持之以恒的最好写照。

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学者，总是力求把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付诸实践，体现了他“知行合一”、“实践为本”的精神品质。当年他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正是清王朝刚刚覆灭，共和初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争，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异常激烈，南北军阀不断混战。毛泽东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既读有字之

书，又读无字之书，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参加了反对校长的护校斗争，主持学友会，主办工人夜校，创立新民学会，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经世致用”的思想，投身于改造社会的伟大运动中去。

两次北京之行

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曾两次来到北京，来到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接受了这场在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他在这一时期的读书生活，无疑成了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时期。

1918年6月下旬，此时已在北京大学执教的杨昌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到北大读书，同时也有机会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十分高兴。8月15日，为了处理湘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毛泽东就与张昆弟、罗学瓚、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人北上。19日，他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毛泽东整日忙于赴法前的组织工作，时间一长，生活也变得艰难起来。这时，经杨昌济先生介绍，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

毛泽东
风采

当了一名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的工资是8元钱。

毛泽东的工作是在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登记和管理新到的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工作是琐碎的，但他干得很投入，认真地履行着职责，以致后来，在对图书的收藏兴趣上，在对经手的书籍的爱护上，他都显出一些职业的习惯，这也许与他的这段经历有关。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一极好的学习机会，广泛地研读介绍各种新学说、新思潮的书籍和报刊。在阅览室，他认识了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还专程拜访过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陶孟和、周作人等人，与他们讨论问题，畅谈时局。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状况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幸而为时不久，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潮已开始席卷中国知识界了。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了人类历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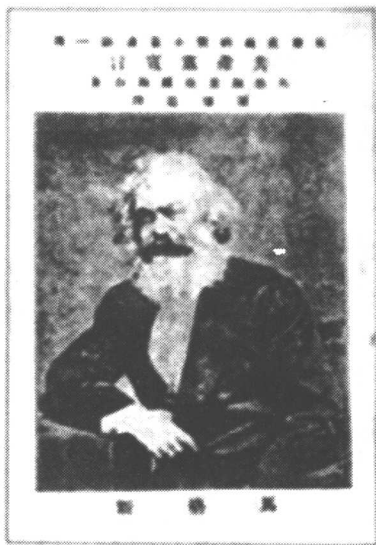
新纪元，也结束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历史，转而以俄为师。就在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首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一文，以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充满激情的文章，虽然还未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系统的介绍，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激进青年去追求真理。当时，毛泽东在工作中结识了李大钊，而李大钊也十分器重他，认为他是湖南青年的杰出领袖，常推荐书给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再一次迅速转变。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又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9年才读马列主义。”他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觉醒，开始抛弃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学说”，克服了十分驳杂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考虑中国革命长期没有解决的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问题，成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次思想突变的最后完成是在次年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中。

毛泽东

风采

1919年3月，毛泽东偕同一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开了北京。但他决心留在国内而没有去法国，重又回到了湖南。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和领导了湖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随后，他又组织了驱逐湖南蛮横残暴的地方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为了实现驱逐目的，毛泽东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第二次来到了北京。在紧张的政治活动的同时，他还追随当时北京政治思潮的热点，阅读了那些影响他终身的书籍。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中国，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联系，研究了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报章上介绍俄国革命、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有的还摘译了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一些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中译本也已开始出版。毛泽东这时来到北京，频繁地与李大钊交往，并努力搜寻当时能够找到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近况的书刊。后来，他得到了一本中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并以极大的热情，专心致志地阅读了这本共产主义纲领性文献。青年毛泽东被书中鲜明的思想观点震撼了，他反复阅读着、思索着，并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这是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及1920年10月出版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在1920年阅读了这两本书，“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对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他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

毛泽东
风采

是中文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们可以从中再一次看到，在毛泽东寻找革命真理的最关键时刻，书籍给予他的提示和影响是多么的大！

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

从第二次北京之行回到湖南以后，已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就积极投身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的社会活动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发起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

1920年7月31日，湖南《大公报》上刊出了毛泽东草拟的《发起文化书社》的文章，指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



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在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非常看重书籍在传播新思想运动中的地位。他由自己读书而发展到推广大家读书，这是他改造国民思想的第一步。

8月2日，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文化书社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指出：“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在10月22日召开的第一次议事会上，易礼容当选为经理，毛泽东则担任“特别交涉员”的职务。

作为特别交涉员，毛泽东曾给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人写信，请他们作为书社的信用代表，代售进步书籍。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文化书社办得很兴旺。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所载，自书社营业起，7个月内销售200本以上和100本左右的书就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务政府与中国》、《晨报小说第一辑》、《杜威五大讲演》、《社会与教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

毛泽东
风采



毛泽东在故居看自己青少年时代读过的书籍。

《托尔斯泰传》、《白话书信》、《尝试集》、《现代教育趋势》、《新标点儒林外史》、《新标点水浒》、《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有《劳动界》、《新青年》、《新生活》、《平民教育》、《新潮》、《新教育》

等；重要的报纸有《时事新报》、北京的《晨报》等。后来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中，在“书之重要者”一栏又更为详细地罗列了文化书社的经营书目。湖南的许多青年从文化书社得到了新知识、新思想，尤其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通俗刊物《劳动界》，以工人群众为主要对象，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工人中影响很大。

这些在当时代表着最新思潮的书籍，毛泽东未必本本都精读过，但是作为特别交涉员，这些书大多是根据他的意图，甚至是他亲自挑选购进的。因而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进步意义的书籍，曾对毛泽东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首倡文化书社以后不久，毛泽东又投身于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毛泽东彻底结束了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活，结束了他思想上最初期的探索，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的艰苦战争岁月和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政务活动，使他不可能再像学生时代那样以读书为主业，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但是，从井冈山的草棚里，长征途中的马背上，到延安的土窑洞，北京古朴

毛泽东
风采

的菊香书屋，书籍都始终伴随着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始终把读书作为寻求真理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
风采

戎马倥偬，
读书不辍

——毛泽东革命战争时期的读书生活

毛泽东
风采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年间，毛泽东是在残酷和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度过的。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和智慧，特别是当他到达延安并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者后，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他更是抓紧时间学习。在不断的刻苦学习和思考中，他指挥人民军队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也完成了统一全党思想的工作，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读书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著作和哲学著作，这是他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所必须的。

艰难岁月的寻觅

毛泽东是在1920年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他最早读列宁的著作，大致是在1926年。1926年5月至9月间，毛泽东曾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次，他在讲话中说：“此时（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时），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重新建设的……”

我国最早的《国家与革命》的全译本，是由柯柏年翻译，于1927年1月15日发表的。因此，毛泽东在1926年提到的《国家与革命》是节译本。但随后不久，毛泽东即把列宁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学说付诸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领导了1927年的秋收暴动，后来又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他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来指导革命实践，并多次将它列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必读书。

1929年，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斗争条

毛泽东
风采

件十分艰苦，在湘赣闽一带农村进行土地革命的毛泽东于1929年11月28日给中央写去一封信。信中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越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就越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战士的头脑，毛泽东重视书籍的心情，跃然纸上。同时，他怕此信不起作用，又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李立三写去一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

在随后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有感于党内、军队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空气的缺乏，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列入了决议的“党内教育问题”一节里。

毛泽东一方面向上海的党中央求援，一方面注意从当地搜寻马列书籍。当时军队在农村，这类书籍不好找。1932年，红军打下了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书籍，于是政治部下令将这批书籍上交。这批书包括军事、政治、科学等方面，其中有一部分马列著作，大概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

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这些书后来都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他认真地阅读了，尤其喜爱列宁的那两本，认为从中可以找出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比较喜欢读列宁的书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这些书，还热心地推荐给身边的指挥员看。彭德怀回忆说：“1933年，我接到毛泽东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来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读了这两本书，思想水平大为提高。这两本书后来不慎丢失了，彭德怀曾非常惋惜。

1934年开始长征时，毛泽东病倒了。在遵义会议之前，他一直是躺在担架上的。但据当时护理他的医生回忆，他那时仍然手不释卷地读一本书，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就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遵义会议以后，他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使中国革命摆脱了危机。

毛泽东
风采

延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党中央和红军来到了陕北。尽管当时条件是艰苦的，但相对平静的生活却使毛泽东有较为充足的时间读书。早在反“围剿”失败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途中，毛泽东就深刻地思考过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它的前途，深感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的重要性。因此，他用自己的话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这一时期他所读的书中，马列主义方面的著作是第一位的。就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简陋的窑洞里，他较为系统地研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并且积极思考，勤奋写作，完成了大量闪烁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重要文章，从而奠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指导地位。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我们看到了至今仍保存在那里的一批书籍，纸张已经发黄，陈旧的书页上用墨笔标着不同的记号，这就是一些当年毛泽东在延安阅读过的马列著作。这些书籍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苏联出版的中文本）、《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收有斯

毛泽东
风采

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关于辩证法的笔记》等。另外两本列宁的名著《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他长征后带到延安的，书已经破损，但毛泽东仍反复翻阅。就在这两部书中，有用几种不同颜色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二读”、“三读”字样，并有不少批语。

这个时期，也是毛泽东大力提倡党的干部读马列书籍的重要时期。毛泽东的这些建议都较好地得到了贯彻，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为全党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出了正确的方法。他说：“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多次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干部应该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他在1942年11月西北高干会上说：“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
风采

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集》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的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在同一时期，他在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凯丰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设想：“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稍后，1943年4月22日，他又在给凯丰的信中提到此事：“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为了培养全党阅读马列主义书籍的风气，毛泽东从确定书目到组织翻译原著，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虑，这一切都浸透着毛泽东对马列著作的无比热爱！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是我党思想上成熟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在这次重要的大会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十分重视阅读马列原著的同时，并不忽视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书籍，并把它视为接受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1936年10月22日，他给当时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信中说：“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10种至15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50部，共价不过100元至300元……”信中提到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柳湜的《街头讲话》也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介绍社会科学知识的通俗读物。在此后不久，毛泽东着重阅读了两部苏联人撰写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一部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书初版于1932年9月，1935年6月就印了第三版。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间读这部书的第三版。他读得很仔细，并用铅笔、毛笔做了大量批注，从字迹看，他研读了多遍，许多章节至少批注了三遍。这些批注，既有对原作内容的提要，又有对原作内容的评论，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发表感想，对一些理论观点作了发挥。批注较多地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尤其集中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部分，其中又以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最多。他批注道：“所谓对立统一，就是统一物分裂为

毛泽东

风采

互相排斥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互联结。这就是所谓主要矛盾，所谓自己运动的源泉。”他还在批注中，用“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共产党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许多情况，说明对立的互相渗透、互为转变的哲学思想。在谈到主要矛盾时，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批注道：“九一八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性，证明了民主共和国的可能，这样去解决这个主要矛盾。”

1937年7月前，毛泽东又阅读了苏联米丁等人所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在这部书中，他主要集中阅读了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几节。

毛泽东读这两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花费了相当多的功夫，对许多哲学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不久，毛泽东就着手撰写了他的著名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在这两部著作中，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批判了严重危害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其中有许多哲学观点参考了上面的两本苏联哲学教科书，许多精彩的论述也可以说是在读那两本教科书时所写批注

的提炼。可见，毛泽东阅读这两本书对其哲学创作活动的影响之大。

1937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读到了一本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艾思奇所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在阅读后，大段摘录了艾思奇著作中的许多重要论点，他还在摘录时，对著作中的一个论点发表了不同看法。

艾思奇在书中说：“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在摘录了上述一段话后，写道：“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座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随后，毛泽东特别注

毛泽东
风采

明“毛泽东意见”。不久，他又给艾思奇写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艾思奇当时只是一个年仅 27 岁的青年理论工作者，在毛泽东读《哲学与生活》时，他刚到延安不久。而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如此认真阅读他的书，而且还把读书摘录送给原作者看，并主动提出要去看他，表现出求知者的谦逊作风和不耻下问的高尚品格。

1938 年 1 月至 3 月，毛泽东又阅读了 1937 年 5 月出版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对这本书十分赞赏，认为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他还在不同的场合称赞和推荐过《社会学大纲》，他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 10 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接着他又说：“李达还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他还

向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推荐，说《社会学大纲》是本好书，在 10 年反动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

在读这本书时，毛泽东突然做起了“读书日记”，这是仅存于今的惟一的一份毛泽东读书日记。“日记”是从 2 月 1 日开始写的。他写道：“20 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 月 17 日至昨天看完第一遍，《唯物辩证法》，从 1—385 页。今天开始看第二遍，《当做科学看的历史唯物主义》，387—416 页……”以后，毛泽东每天大致读此书 25 页左右，至 3 月 16 日看完。书中的批注至少有两种字迹，其中批注的重点是第一篇的《唯物辩证法》。在此书第一篇第三章中，作者阐述了辩证法三大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包括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毛泽东对这个论点以及相关的论据画了大量的记号表示赞同。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表达了与李达对此问题相一致的观点。

1938 年 9 月 12 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

毛泽东
风采

题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此文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第4章第2节，发表时没有署名。博古翻译了此文，并于1938年12月在延安出版了单行本。博古在此书出版后，即送了一本给毛泽东，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泽东同志惠存博古”。毛泽东接到此书后，即阅读了这本小册子。从书中的批注看，毛泽东对这部书并不十分欣赏。不久，斯大林所著的《列宁主义问题》出版，收入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此时毛泽东才知此文是斯大林的手笔。

1939年5月，艾思奇编辑的《哲学选辑》在延安出版。这本书收集了当时延安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有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米丁等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米丁等人编的《新哲学大纲》。书后还有两个附录，其一为斯大林著、博古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二为艾思奇本人写的《哲学研究提纲》。这部书所收的著作，毛泽东大部分已经看过，但他还是又认真地、从头到尾地通读了一遍。在他较为集中阅读的艾思奇的《哲学研究提纲》中，批注的文字有3200多字，占全书批注文字的2/3。

1936年12月，西洛可夫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延安出版第四版，毛泽东在1941年3月重读了此书。此次再版与第三版相比较并无大的改动，而毛泽东阅读的着重点却有所转移，他着重阅读的是该书最后一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伦理学”。在批注中，他针对书中的“中国主观主义”这一部分内容，所作的批注达20多处。这是他联系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从理论上去寻找产生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论的根源。在批注中，他写道：“中国主观主义者与张国焘主义者的方法论都是机械论”，“中国的反列宁主义的活动是可惊的”，“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中国主观主义者有许多折衷论，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书中在谈“惟理主义”问题时说：“那样的惟理主义，曲解了科学的历史中理论与实验之实际的关联……”毛泽东在此画了许多横线，并批注：“中国的教条主义正有这种曲解。”不久，毛泽东即亲手发动了一场旨在批判中国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延安整风运动，从而在党内较为彻底地肃清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思想，为保证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思想上作了准备。

不久，毛泽东又阅读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毛泽东
风采

家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书。毛泽东主要从这部著作中归纳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一些基本原理。这部书讲了不少经济方面的理论，毛泽东在这方面所作的摘要和引申的文字并不很多，这与当时毛泽东所主要思考和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毛泽东仍不忘把这些书推荐给其他同志。在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以中央研究组组长的名义，与副组长王稼祥联合致信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的同志，信中说：

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

(一)《“左派”幼稚病》(用1939年解放社版)；

(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8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

(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6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伦理学”；

(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毛泽东将自己熟读的这几部哲学著作向党内高级

干部推荐，是希冀通过共同阅读这些书籍，来提高党内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经常阅读的是列宁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国家与革命》，另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是结合当时迅速发展的中国革命形势而重新研读这些马列著作的。在一本《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他写着“毛泽东 1946 年”，扉页注明“1946 年 4 月 23 日在延安起读”。他在这本书中的“阶级社会与国家”一章中，几乎每句话旁边都画着杠杠；在列宁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如“革命”、“消灭”、阶级斗争是“全部学说的基础”等画着两条粗杠，特别引人注目。当时，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爆发在即，是以温和的方式向反动派求和，还是拿起武器，捍卫革命成果，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毛泽东在此时重读列宁的这本著作，接受了列宁的革命理论，从而明确了共产党此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并积极动员解放区的人民，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号角。

正当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国民党军队的时候，为了克服革命队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防止重犯急躁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又重温了他曾在闽

毛泽东
风采



1946年，毛泽东在枣园窑洞中写作。

西中央苏区就读过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反复从书中寻找思想的源泉。1948年4月21日，他在看完了书中第2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后，在封面上写道：“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2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1948年6月1日，全国解放在即，中宣部发文要求全党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的第2章。解放战争的圆满而迅速的胜利，证实了毛泽东倡导干部学习列宁的有关论述的成功和必要。



“作工具的研究”

为了探求中国革命的真理，毛泽东曾悉心研读过马列主义著作，但他并不排斥对其他哲学书籍的学习。作为思想家，他对深奥的哲学问题有着极浓厚的兴趣。据20世纪30年代在延安采访的斯诺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后来，毛泽东在给别人的的一封信中，这样分析自己的想法：“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他把哲学作为研究历史的工具看待，尽管后来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但他阅读过的大量哲学书籍却给了他丰富的智慧。

毛泽东
风采



1936年6月至10月，埃德加·斯诺在陕甘宁根据地停留了5个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和一批红军将领及指战员，写出了第一部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书《红星照耀中国》。这是1938年在上海出版的中译本《西行漫记》。

对逻辑学的兴趣 从1912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初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逻辑学著作《穆勒名学》起，毛泽东一直十分爱读逻辑学著作。毛泽东的文章气度恢宏，论证严谨，逻辑性强，这与他长期注意培养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有关。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阅读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

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曾受苏联学者的影响，把形式伦理学（即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并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批注。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矛盾论》初稿中就留有不少此类论述。1938年春，在写作《矛盾论》半年以后，毛泽东刚读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他在3月25日读《战争论》第111页时，突然收到了潘梓年寄来的新著《逻辑与逻辑学》。在这一天的读书日记中，毛泽东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接着，他用了三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该书。毛泽东何以如此看重此书？

原来，这部出版于1937年10月的学术著作，主要探讨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将逻辑分为方法论（逻辑学）和技术论（逻辑术）两部分。这部书虽然未能彻底克服将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缺陷，但它试图在方法和技术的名义下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这正是潘梓年独特的见解，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教科书中将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完全等同，并加以抛弃的看法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正是毛泽东感到“颇为新鲜”之所在。

毛泽东
风采

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 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一门学问。毛泽东对自然科学较为生疏，但他却对自然科学著作抱有求知的兴趣，尤其十分关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1940年初，延安自然科学界酝酿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在此之前，毛泽东会见了参加筹备工作的于光远、屈伯传等人。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之后，毛泽东欣然接受参加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邀请。2月5日，毛泽东到会并讲话，他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这年的6月，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的一次晚餐上，毛泽东向身边在座的于光远问起了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情况，并说：“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不研究自然辩证法，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概括出来的。”他希望延安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多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1943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一封信中写道：“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

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这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是指苏联科普文学作家伊林和他的夫人谢加尔合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这是一本讲人类发展史的通俗读物。看来毛泽东是很想读一读这本书，尽管是“通俗”的。

4天以后，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信，向他推荐一本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从猿到人》的小册子：“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随信还寄去这本《从猿到人》。这本书收入恩格斯的两篇文章是《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和《人类进化的过程》（即《〈自然辩证法〉导言》）。信中提及的郭烈夫（原名彼·伊萨科维奇）宣扬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以上这三篇文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谈论人类进化问题的，是自然辩证法领域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丰富了毛泽东的唯物史观的思想。

在1948年至1949年曾兼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的自然辩证法专家于光远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在这个图书馆的藏书，有毛泽东同志阅读过的书籍，其中有不少他圈点过、画过杠杠、作过记号、批注有字句的书籍。这些书中有不少本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虽然我当时没有特别注意学习其中有哲理性的批注，

毛泽东
风采

但是有一个印象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的烽火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不时阅读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书籍。”

用历史唯物论批判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古代哲学思想，尤其是先秦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 2000 多年以来的哲学发展基础。延安时期的 1939 年，毛泽东曾集中对儒、道、墨这三个重要的古代哲学派别的主要哲学观点发表了看法，表明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浓厚兴趣和在这方面的读书重点。

事情是由陈伯达的三篇学术文章《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引起的。这三篇文章在 1939 年至 1940 年分别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杂志。在文章发表之前，毛泽东已阅读过，并通过未公开的书信的方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939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给陈伯达写去一封信，称赞陈伯达所写的《墨子的哲学思想》，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毛泽东的这番话，也就是肯定墨子是中国的一位具有朴

毛泽东
风采

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古代思想家。在另一张纸上，毛泽东写下了他对墨子思想的想法。

他认为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路线斗争，反对过犹不及。“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同。然而就此把墨家说成折衷论，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他认为“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好此解。”

关于墨子中谈到“正，端”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有限与无限问题。”

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又给张闻天写去一封2000多字的长信，继续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发表看法。

《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认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但作为片

毛泽东
风采

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毛泽东认为上面陈伯达文章中对此的解释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不足，“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毛泽东认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中的相关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对的，他在信中引了这段注文：“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而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他进而又结合现实分析道：“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他称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

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此后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时，毛泽东对孔子的“中庸”问题又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批注，更加准确地剖析了孔子哲学的实质。他批注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

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另外还谈到了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的问题，他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他主要分析了孔子学说中的“知仁勇”的说法，认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他还深刻地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他认为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不大严肃。

通过上述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零散的看法，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诸子的书籍如《论语》、《中庸》、《墨子》等曾做过深入细致的阅读，而在对这些古代先哲的思想进行批判时，他又总能采取辩证

毛泽东
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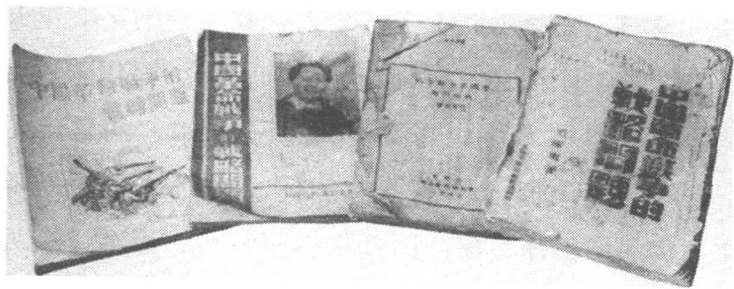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因此他的批判总是深刻犀利的。

对于当时中国哲学界的研究现状，毛泽东也曾十分关注。他在1939年2月22日写给张闻天的又一封信中，谈了他的一些想法。他说：“伯达此文（指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引者注）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这里的章、梁、胡、冯诸人是指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学者。他们是近现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对我国古代哲学有深入研究，他们的研究虽然引用了西方的科学方法，与旧式学者不同，但他们大都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毛泽东认为：“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冯（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相信他们的危险。”看来，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学术界的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界限的划分问题，后来，他一直致力于领导学术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清算和斗争。

毛泽东
风采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 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曾读过大量军事学著作，而且还十分善于从这些书籍中获取具有哲理性的启示，并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他的军事学方面的论著，无不闪烁着哲学思想的光辉，可以说，在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是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

中国古代军事哲学的代表作是《孙子兵法》，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著名的军事家都研读过这部书，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十分推崇这部书，1936年10月22日，他在致西安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说道：“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后来，他反复研读。在他的著作中，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战略等。

图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各种版本。

毛泽东
风采

我们看到毛泽东十分重视孙子军事思想的运用。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后来，他反复引用这句话，告诫人们：“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除了学习中国古代军事哲学著作外，毛泽东还认真地阅读过一本 19 世纪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那是在 1938 年 3 月，他得到了一本《战争论》。3 月 16 日，他刚读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8 日，他就开始阅读《战争论》，一口气就读完了该书的序言和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这年的 9 月，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就在他的窑洞里开了一个哲学座谈会，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艾思奇、徐懋庸等人，每周一次。一开始，就是学习《战争论》。他们请了懂德文的何思敬对原文随译随讲，何思敬不懂军事，因而讲得很外行，而毛泽东听得却十分仔细，还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着。后来徐懋庸回忆说：“我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得怎么糟，他总

毛泽东
风采



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的。”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曾一度掀起了翻译和评价克氏《战争论》的高潮。后来，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专著时，就吸收了许多《战争论》中的军事哲学思想。

“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有一个读书重点，就是阅读鲁迅先生的著作。

毛泽东最早读鲁迅的文章，大概是在五四运动前后。那时，青年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而当时鲁迅的名篇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思想敏锐的毛泽东从这些文章中受到过深刻的启发，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以后，毛泽东走上了与鲁迅不同的两条战斗道路。鲁迅在“白区”，使用着“批判的武器”，进行着韧性的战斗；而毛泽东则发动了农村暴动，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后来又转战南北，从事着“武器的批判”。但毛泽东始终对鲁迅的著作有所偏爱，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没有见过鲁迅，但他比较早就十分关注鲁迅。1933年，曾一度作为党的代表，与鲁迅保持密切关系的冯雪峰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调到中共苏区中央党校工作。那时，毛泽东受到王明的排挤，心情抑郁，听说冯雪峰是从鲁迅身边来的，就主动找冯雪峰攀谈，而冯雪峰也一有空就从中央党校跑到毛泽东那里去聊天。他们之间聊得最多的，就是鲁迅。一次，两人一坐定，毛泽东就出题目：“今天不谈别的，就谈鲁迅，好不好？”冯雪峰热情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他是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鲁迅的人。毛泽东听得十分认真。听过冯雪峰的介绍，毛泽东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

到了延安后的1938年，毛泽东给当时在延安抗大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去一封信，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那时，延安条件艰苦，书籍奇缺，毛泽东想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其心情甚为急迫。这年8月，以蔡元培为首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并在上海出版。这是《鲁迅全集》的首次出版，共印了200套纪念本，编号发行。中共上海地下党为毛泽东搞到了一套，并辗转送到陕

毛泽东
风采

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的这套《鲁迅全集》纪念本的编号是58号。

毛泽东对这套装帧精美的《鲁迅全集》十分珍惜。在后来转战陕北的行军中，许多书籍和日用品都丢弃了，而这套《鲁迅全集》与一些最重要文件一直保留在身边。后来，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这套书终于走进了中南海。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阅读这套《鲁迅全集》时，抚摸着已经发旧的封面，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和敌人交火。这些书都是由战士背的，他们又要行军，又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这些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把这套《鲁迅全集》放在身边，一有空闲，就在烛灯下捧读。他看得很仔细，一些印刷错误也都一一改正过来，还写有小批注。比如，在这套《鲁迅全集》中有《唐朝的钉梢》一文，其中引了唐代张泌的《浣溪沙》第九首，其中有“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一句。毛泽东从音韵学的角度考证出“从”字应为“是”，并在书中注出。后经查阅，原诗果真是“是”。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对鲁迅有过两次比较全面而

精辟的评价。一次是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他作了《论鲁迅》的演讲，他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文章写得好，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1940年1月，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论》，再次热情地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些精辟论述和高度评价，是在熟读鲁迅著作，认真地剖析和透彻地理解鲁迅著作深刻内涵的基础上作出的。

关于鲁迅的创作，毛泽东曾在《论鲁迅》的演讲中作了生动的表述，他说：“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

毛泽东
风采

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

鲁迅在他 3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得最多，也最有特色的，是他的杂文。这些杂文，笔锋犀利，是他在与反动派进行文化上的斗争中形成的特殊风格，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的杂文，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我们还可以在毛泽东的某些文章中体味“鲁迅式”的犀利和幽默，这些无不是毛泽东深受鲁迅杂文影响的结果。

在 1939 年的“一二·九”运动纪念大会上，毛泽东谈到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正处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的情形时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

在如何看待鲁迅杂文的讽刺和揭露风格的问题上，毛泽东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的“暴露人民”的观点，指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么‘杂文时代’的鲁

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党八股”是毛泽东最早指出并加以系统论述的，但它却脱胎于鲁迅的“洋八股”。毛泽东曾说：“党八股也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

鲁迅曾在《伪自由书·透底》一文中写道：“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乏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在此文的附录中，鲁迅又说：“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鲁迅所批评的“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東西。毛泽东借用鲁迅的这个名词并加以翻新，来活脱脱地勾画出中国共产党内主观主义者的形象。在《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中，列举“党八股”第二条罪状时，文中写道：“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毛泽东
风采



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2月，毛泽东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阐述了整风的方针和任务。图为当时出版的这两个报告的单行本。

在毛泽东演讲《反对党八股》的那次延安干部会上，还散发了由毛泽东亲自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其中就收入了论鲁迅创作的《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在为这篇文章作介绍说明时，毛泽东写道：“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来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当讲到鲁迅在文学中指出“写完后至少看两遍”时，毛泽东说：“至多

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在解释鲁迅所说“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时，毛泽东又说“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这本《宣传指南》曾作为延安整风 22 本必读文件之一。就在延安时期，鲁迅的文章就被全党干部广泛地学习和讨论了。

毛泽东最喜爱鲁迅《自嘲》中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曾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1944 年 1 月，山东省文协曾给中央总学委打电报，询问《讲话》中解释“千夫”的那句话是否有误，要求“请问明毛主席电示为盼”。2 月 8 日，毛泽东在回电中坚持了他原来的解释，并说：“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的确，毛泽东是十分善于深入鲁迅作品的深层去体会其中的内涵的。

毛泽东和鲁迅，是我们时代的两位巨人，他们在气质上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毛泽东曾评价鲁迅说：

毛泽东
风采

“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毛泽东自身的写照。

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书

有着旧学功底的毛泽东，历来十分喜欢阅读中国史书。延安时期，虽然有了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但是由于专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加之书籍的缺乏，这一时期毛泽东未能系统地阅读中国历史书籍。但一方面出于他的兴趣，另一方面出于他希望能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清算中国历史，所以在这一时期，他十分重视阅读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并提出不少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都对后来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不小的影响。

范文澜是当时的治史大家。早在1940年1月，他就赴延安参加革命，毛泽东曾为延安有这样一位大史学家而高兴。在延安，这两位热爱史书的人经常互借书籍，一次谢觉哉向毛泽东借一些古代文人的笔记小说，毛泽东在回信中说：“《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

还有一次，范文澜送给毛泽东一套明人《笔记小说大观》，毛泽东十分高兴，经常阅读，还在上面做过批注。

1940年秋季，就是范文澜初到延安的第一个秋天，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了一次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去听了讲演。会后，范文澜将这个提纲整理出来送到毛泽东那里，请他审阅。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地给范文澜回信：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不知对康梁亲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9月5日

毛泽东
风采

在毛泽东的启发下，范文澜重新整理了这个提纲，写成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一书，并开始着手撰写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的中国通史。范文澜曾就这部书的写法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认为：用夹叙夹议的写法比较好。范文澜采用了这种写法。不久，《中国通史简编》前四卷在延安出版。毛泽东读后十分满意，评价说：“《中国通史简编》的资料多，让人愿意读下去。”他希望范文澜能继续写下去，写得再大一些。后来这套书成了毛泽东的案头书。刚解放时毛泽东让他的工作人员把一些常读的大部头的书分装成比较薄的单册，改装的第一本书就是这套《中国通史简编》。

郭沫若是一位具有艺术气质的史学大家。毛泽东与他相识于大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从事古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绩斐然。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国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中。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数万言的著名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夹叙夹议，总结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经验教训。延安的毛泽东很快就读到了这部著作。当时正值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正日益壮大，十分有必

要提醒同志们戒骄戒躁。于是毛泽东从这部史学专著中发现了它的现实意义。他在4月12日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说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延安整风中，《甲申三百年祭》成为全党干部学习的整风文件之一。这年11月，毛泽东又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学研究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并对他今后的研究寄予厚望。

当时，郭沫若在重庆的又一突出成果是写出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一大批新编历史剧，借历史故事，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人民抗击强暴的斗志，揭露了投降派的丑恶形象。这些剧目的上演轰动了山城，受到了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这时，延安的毛泽东也收到了郭沫若寄来的《虎符》剧本。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泽东
风采

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和郭沫若见了面。郭沫若发现毛泽东用的是一只旧怀表，就深情地解下自己的手表赠送给毛泽东。也就是在重庆，毛泽东应柳亚子之邀，写下了《沁园春·雪》一词，以博大的胸怀评点历史：“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一时间，各报纷纷转载，轰动重庆，而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时，郭沫若站了出来，提笔写下应和毛泽东的词作：“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反击了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攻击，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也流露出与毛泽东相通的史学观。

吴晗是一位著名的明史专家，解放前曾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工作。解放后，他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对史学研究，吴晗曾满怀深情地说：“是毛主席教育了我，帮助我克服了‘超阶级’的糊涂观念，才得以在史学的研究和写作中，不断取得了新的成绩和进步。”

此话事出有因。早在1944年，吴晗出版了他的史学传记《明太祖传》。1948年，此书再版，书名改为

《朱元璋传》。1948年11月吴晗来到解放区，他把《朱元璋传》送毛泽东审阅。此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正处在指挥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但他仍抽时间饶有兴趣地看了这部书。不久，毛泽东约见了吴晗，和他谈了一个晚上。吴晗后来说：“那天晚上，毛泽东除了指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以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原来书中有一个细节，关于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首领彭莹玉和尚的下落。书中写道：‘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之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致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晗在书中称赞道：“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其是了不起的人物。”毛泽东却敏锐地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他建议吴晗对这个论断再作考查。几天以后的毛泽东又给吴晗写去了一封信。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
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
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
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

毛泽东
风来

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1月24日

解放后，吴晗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对“彭和尚”这个人物重新考证，写出了新版的《朱元璋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党中央在延安创办陕北公学，指名从国统区的上海抽调艾思奇、李初梨、周扬等人到延安，充实教学骨干和领导力量，何干之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已是一位历史学家，著有《转变期的中国》、《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书。他到达延安后，工作热情很高，教学之余，他设想编一本《中国民族战争史》。1939年1月，他把自己的这个设想写信告诉了毛泽东。1月17日，毛泽东回信。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

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泽东

1月17日

在当时战争条件下，毛泽东正忙于领导解放区军民抗击日寇，而他在信中却仍表示抽时间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并立志要在将来研究近代史，表达了他对历史研究的一往情深。在信中，毛泽东还以政治家的目光指明在民族史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即要把好大喜功的扩张主义和“积极的抵抗政策”区别开来，他列举了汉代班超在西域与匈奴作战而保证边疆得以安宁的历史来说明这一点，这在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毛泽东历史观的一个重要特点——研究历史要结合现实。

也许是毛泽东酷爱历史，并对此深有研究这一情况广为延安人士所知，所以当时常有作者将书稿或写作提纲寄送毛泽东指教。一次，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开明绅士李鼎铭给毛泽东推荐了一部书稿，书名是《永昌演义》，是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的李健侯先生写的。“永昌”是李自成称帝时的年号。李健侯是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他立志要为李自成作传，历时几年，几易其稿，才撰写成此书。

毛泽东接到书稿后，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并于1944年4月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读后感想：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 2000 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斗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斗争，就是 2000 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李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4 月 29 日

毛泽东
风来

毛泽东热情地鼓励作者，但也坦诚地指出了书稿的不足，再一次希望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能够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重新对我国的历史作出新的解释，而这也正是他在阅读历史著作时经常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

不久，作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赠送他 200 元钱。在毛泽东建议下，李健侯对《永昌演义》进行了认真修改。但遗憾的是，直到 1950 年他逝世，这部小说也未能出版。1984 年，此书才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人们在读到这部李自成传记时，不应该忘记毛泽东曾给予此书的关心和帮助。

从《水浒》、《三国演义》中学习军事知识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对毛泽东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产生了最深刻影响的，还是《水浒》和《三国演义》，这两部书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读的较多的书。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时时研读《三国演义》、《水浒》，显然也有着从中学习战法的用心。而且，这两部书，大概也不只一次地对毛泽东的“埋伏攻袭”起过“有效”的指导作用。光是《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毛泽东就运用过两次。一次是 1928 年 8 月的

“黄洋界保卫战”，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发射了一发炮弹，便把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吓跑。另一次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中的转战陕北时。一天毛泽东被刘戡的追兵逼到了死亡的峡谷，“敌人占着两座山头，居高临下。另一面是咆哮的芦河。毛泽东随行只有二三百人，全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众人皆“把生死交给了命运之神”。而“忽然，毛泽东把烟头掷在地上说：‘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他从容地走上黄河岔的堤岸，不紧不慢地，顺堤向西北方向走去……就这样，毛泽东不紧不慢地在河堤上走着，身后二三百人紧跟着，屏住了呼吸。起初还有一两个子弹在毛泽东的周围钻进泥土，离他只有二三米，随后，奇迹发生了，身后那些山头，枪炮声忽然停止了。刘戡的七个旅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从他们的枪口底下在河堤上走了三百多米，翻过一个小土岗，不见了。”事后，毛泽东谈及此事时，“得意”地唱着：“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番营，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毛泽东不但善于从《水浒》、《三国演义》一类旧小说中吸取战略战术上的经验教训，还善于从这类小说中吸取政略政术上的经验教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些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把古代

毛泽东

风采

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术。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当年巧妙地将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读来的有关战役经验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中，这种做法不知要高出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多少倍。解放后，在与薄一波的一次谈话中，他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还诙谐地说：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共青团员”周瑜，29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

对于《水浒传》，在毛泽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常读这部反映宋代农民起义军故事的著名古典小说，并发表过许多独特的见解。正如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说的：毛泽东“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点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少年时代的热情。”以至于发生这样一个笑话：长征中打下一座县城，毛泽东急于让警卫员给他找一部《水浒》，而警卫员却给他抱来一个“水壶”。

毛泽东读《水浒》最感兴趣的是书中所描写的绿

林好汉豪爽尚义的作风。他最为注意的，是用《水浒》中的故事来阐明现实问题。

1944年1月，延安评剧院排演了由水浒故事改编的评剧《逼上梁山》。这个故事说的是林冲如何由一个禁军教头而走上梁山，参加农民起义的队伍，成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很有典型性。1944年1月9日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观看了这出戏。当晚，他给中央党校的负责人杨绍萱、齐燕铭写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毛泽东在这里仅仅是就一出戏的改革给予肯定，最主要的是他对于在当时战争环境下，这出戏中表现的内容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予以肯定。同时，他与戏中所表现的内容有着强烈的共鸣。

毛泽东
风采

菊香与书香

——毛泽东建国后的读书生活

毛泽东
风采

在北京中南海的红墙内，有一所古老的大建筑群。
在这个建筑群的东侧，有一座幽静的院落，门厅的匾额上书写着“菊香书屋”四个大字。然而这里并没有一株菊花，更没有菊花的馨香，却只有数株苍劲挺拔的古柏，凝重而庄严。这里就是建国后毛泽东的居所，有他的藏书室，还有一间名叫“紫云轩”的办公室兼卧室。这里到处都摆满了各种书籍，建国后，动荡的战争环境带给毛泽东的图书匮乏的困扰已经过去，毛泽东让人多方面购置图书，逐步建立起了达数万册藏书的书房。其中除政治、经济、哲学、自然科学之外，最多的就是经史子集等中国古代文化名著了。从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的同时，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阅读中国历史名著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并不间断地研究马列主义著作，还广泛涉猎了自然科学著作和外语类书籍。伴随着书籍，毛泽东度过了他辉煌的后半生，并用书籍慰藉他临终前心灵的孤寂。



毛泽东一生勤奋读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

研读“正史”

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编修历史的国家，这一点十分突出地体现在《二十四史》中。这套大型的纪传体史书，成书时间从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开始，到清乾隆时代止，长达1900多年，它记载了中华民族3000多年的发展史。有人说，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之所以延绵不断几千年，在一定程度上与《二十四史》的编修有很大的关系。

毛泽东
风采

毛泽东酷爱《二十四史》，对这部大型史书，他一生不知读过多少遍。他在自己那部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上面，写满了手书的批注。他曾说过：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汉代司马迁所著。鲁迅曾给予这部史书以极高的评价，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泽东也从史学的角度，评价说：“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是很严格、准确。”

《史记》中有一篇非常突出地代表了作者进步思想的文章《陈涉世家》。司马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敢于为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作传，并将之列于《孔子世家》之后，足见他的胆识。毛泽东在读这篇传记时，用红、黑两色铅笔作了大量的圈画。毛泽东首先是从总结农民起义的失败教训这个角度来阅读这篇传记的。

《陈涉世家》记载，当陈胜自立为王以后，他以前的一些伙伴来找他，陈胜接待了他们。但是其中有一位常常毫无顾忌地谈论陈胜当农民时的贫困往事，陈胜感到这样影响了他的威望，于是把他杀了。从此，那些旧时的伙伴纷纷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亲近

陈胜了。在这段文字的书页天头上，毛泽东用红铅笔批注两个大字：“一误”。陈胜自立为王以后，任用朱房为掌管人事的官员，胡武为监察过失的官员。而这两个人却胡作非为，对许多不顺从他们的将士随意治罪。后来，许多将士见此都不愿意追随陈胜了。毛泽东在此又批注了两个大字：“二误”。这很少的几个字，内涵却相当丰富。保持本色，不脱离本阶级的群众；任用贤能，打击邪恶，这两条来自2000年前农民起义的教训，牢牢地记在了毛泽东的心中。

西汉班固所著《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毛泽东和周谷城在中南海游泳后，俩人并肩坐在遮阳伞下谈古论今。毛泽东顺手拿起一本线装书，翻到了某一页看了一眼，就说：“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毛泽东拿的这本书就是《汉书》，他翻的这页是讲《赵充国传》。

毛泽东在读《汉书》时，还对贾谊这个人物给予很大的关注。贾谊，汉文帝时官拜太中大夫，因主

毛泽东
风采

张改革而被权贵所妒，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文帝召他回京，任文帝之子梁怀王太傅。后因梁怀王坠马丧生而郁闷死去。毛泽东对此十分惋惜，他曾在《汉书》上批注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毛泽东十分欣赏《汉书》中贾谊的《治安策》一文，该文文笔朴实犀利，感情真挚，是一篇极好的政论文。他在1958年4月27日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极力推崇此文：“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象，值得一看。”

《后汉书》的纪、列传为南朝范曄所撰，志30卷，为晋司马彪撰。毛泽东曾在《后汉书》的一册封面上写道：“《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还有一次，他鼓励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看《后汉书》，并分析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趣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毛泽东十分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提取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后汉书》中记载着一个著名典故“梁上君

子”，说的是汉灵帝时的陈寔，为人豁达公正。一次一个小偷到他家行窃，潜于梁上，被陈寔发现。他并没有大声张扬，而是起床穿戴整齐，把儿孙们唤醒，召集在一起，严肃地训导：“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闻言大惊，遂自投于地，叩头请罪。陈寔对小偷说：“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并赠给他两匹绢。从此这个县就没有发生过盗窃事件。毛泽东读至此，十分同意陈寔的做法，他批注：“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后汉书》中，有篇《张鲁传》，记载了汉末张鲁设“五斗米道”，组织下层人民进行起义的故事。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人物，他在1958年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亲自为《张鲁传》作注，印发给与会者。对其中，“置义舍”、“置义米肉”（吃住不要钱），“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政社合一）等做法很欣赏。

《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毛泽东十分喜欢阅读的一部。曹操是《三国志》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三国演义》中预测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毛泽东对曹操这个人物也十分关注，对《三国志》中的《魏书》的《武帝纪》、《文帝纪》、《刘表

毛泽东
风采

传》中有关曹操的议论，都作了不少的圈画和批注。

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为全国统一打下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在《魏书·武帝纪》卢弼、裴松之的注释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他都圈点和画重线。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读《三国志》，还特别注意注释。注释中涉及曹操的内容，他也很注意。在《魏书·刘表传》中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画着曲线，天头批注：“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卢弼在刘表传记的注释中说刘表“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占“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并于公元 200

年自立为帝。毛泽东在此批注：“做土皇帝，孟德不为也。”以上两条都表示了对刘表的否定和对曹操的肯定。而在另一处卢弼的注文处，毛泽东又为曹操辩护。卢弼说：“曹操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操）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毛泽东批注：“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在平常的谈话中，常常引一些三国的故事。在“大跃进”之后的几次会议上，他常常提到三国时的郭嘉这个人物。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他说：“《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了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进而他又说：“‘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欲与共济天下大难’。”毛泽东从《三国志·郭嘉传》中悟出了处事多谋善断的重要。

三国时期，正是战争频仍的时代，毛泽东在读《三国志》时，对书中记载的著名战役吴蜀彝陵之战

毛泽东
风采

作过一大段批注，显示出他十分善于从古代军事战例中吸取经验，丰富自己的军事知识。据《吴书·陆逊传》载：陆逊用火攻蜀军连营而大胜，接着写了一段评语：“陆逊破先主，意先主连营，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毛泽东批注，对此分析道：“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读《三国志》很细，对书中的一些错误还做过订正。《吴书·吕蒙传》中叙及孙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时，吕蒙说：“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毛泽东认为此处有误，他批注道：“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毛泽东对曹操史迹看来是非常熟悉的。

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混乱的时期，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毛泽东读《南史》，主要对一些古代将领的才华表示欣赏，留下了不少批注。

梁武帝萧衍，原为南北朝齐朝的雍州刺史，后灭齐，建立梁朝。他是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帝王，执政48年，基本保持着和平环境。毛泽东在《南史》

毛泽东

风采

的批注中，对梁武帝前期的军事才能很赞赏。梁武帝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及时在加湖打击齐朝的援军，梁“众军乘流齐进，鼓噪攻之”，很快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天头批注：“打援”。《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武帝派曹景宗去解救被魏围困的徐州刺史昌义之，指令曹在某地与另一援军会合后共同行动。而曹竟单独前进，不料遇到暴雨，淹死士兵不计其数，只得退回。梁武帝得知后说：“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在此加圈注，并写道：“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毛泽东对梁武帝晚年的衰亡，十分注意。书中有一段梁武帝与大臣贺琛的对话，毛泽东一连做了三段批注。《南史·梁武帝纪》载：武帝晚年，一次，大臣贺琛给武帝写了一个奏折，指出当时存在的四条时弊，并建议“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武帝听后十分不快，他对贺琛的奏折——加以斥责。他说，他做皇帝40余年，一直很注意采纳好的建议，而贺琛在朝为官，却如此攻击他，像一个地位低下、品格卑鄙的人一样说话，实在不应该。毛泽东在天头上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武帝在反驳时说，贺琛说当今做官的都通过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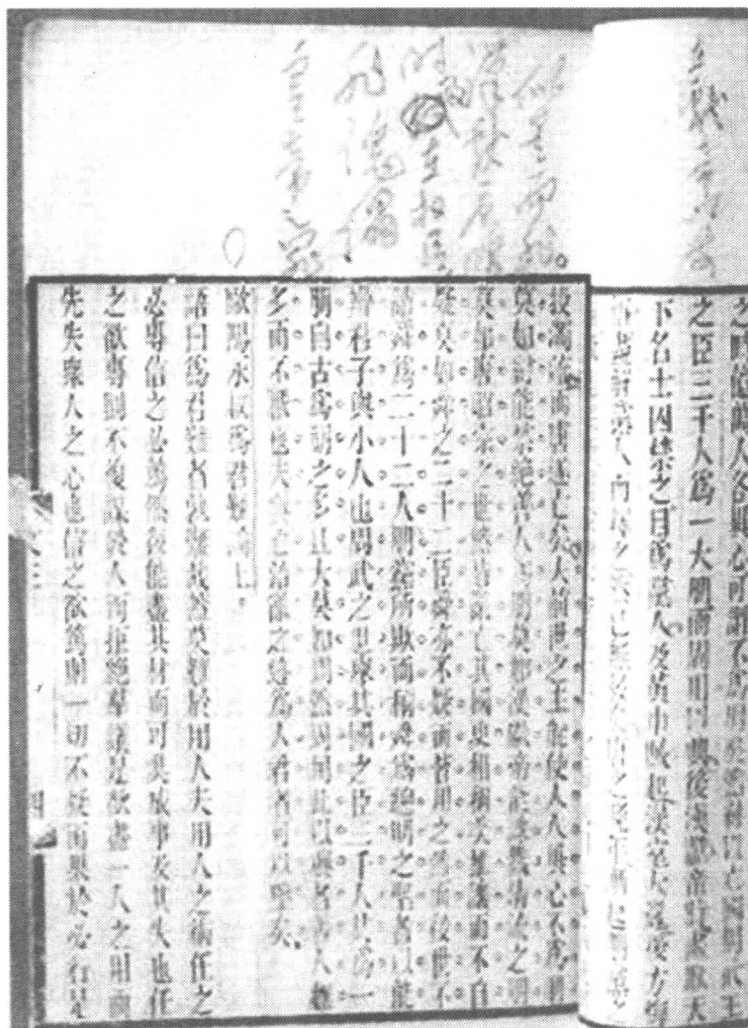
毛泽东
风采

皇帝献媚语而谋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这样做，否则岂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用梁武帝的话来指出梁武帝自身的弱点，一语中的。后梁武帝为侯景所囚，饥饿而死。毛泽东在书中引用了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的两句诗批注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惋惜之情，流露笔端。

在《南史》中，毛泽东对《韦睿传》的批注，大概要算是最多的了，有 25 处之多。韦睿是梁武帝时的名将，很会打仗，为人豁达大度。毛泽东在《韦睿传》的天头上，用粗笔画了四个圈，并标写“梁将韦睿传”五个大字。“躬自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对韦睿评价的重点，曾在此传中两次作此批注。他还在此传的许多处批注有“以少击众”，“决心”，“机不可失”，“善守”，“仁者必有勇”，“不贪财”，“将在前线”，“干部需和”等语，对韦睿的事迹加以概括和好评。《韦睿传》最后写道：“（韦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逐字加旁圈，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这是毛泽东对这位历史人物作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概括。

毛泽东

风采



毛泽东
风采

毛泽东一生中读了大量文史哲经书籍，写下了大量见解精辟的批语，这是他写的一部分批语。

曹景宗是《南史》中的又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曾在一次战斗中召募兵士 7000 余人，大败魏将杨大眼，配合韦睿力攻魏军，虏 5 万余人。毛泽东在此批注：“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对于曹景宗的治军不严、生活腐化，毛泽东批注中多有贬语，同时批评了梁武帝。如搜刮民脂民膏，有人弹劾曹景宗，梁武帝却因他是功臣而加以庇护。毛泽东批注：“使贪使诈，梁武有焉。”然而当毛泽东读到下段文字时，竟有些情不自禁了。书中写道，“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鹿，数助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此邑邑使人气尽。”毛泽东逐字密加圈注，并在天头写道：“景宗亦豪杰哉。”作为从艰难岁月中闯荡过来的毛泽东，当他走进红墙黄瓦的中南海，行动受到很多的“限制”，心中不知会有多大的遗憾！在这里他与曹景宗的独白产生了共鸣。可以说这短短的几个字揭示了毛泽东独特的性格特征。

《南史》和《北史》的作者都是李延寿，毛泽东对这位史学家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曾说过：“《南



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旧唐书》为后晋刘昫监修，张昭远、贾纬等撰写，《新唐书》为宋朝欧阳修所撰。毛泽东常常把两本书对照着读，从史学的角度看，他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马周是唐太宗时的重要大臣，毛泽东对新旧唐书中此人的记载有许多圈点和批注。据记载，马周很有才能，在贞观之治中，他的贡献很大。马周在公元632年给唐太宗上过一道奏折，建议唐太宗在盛世时，仍应节俭治国，还要重视人民的作用；在政治制度上要加强郡县制，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毛泽东对这篇奏章评价很高，在《新唐书》这篇奏折的文字上面，毛泽东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以政治家的眼光评论马周的奏折，将之与贾谊的治安策并列，强调他的政治意义，而反对夸夸其谈。关于马周，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说：“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毛泽东在批注中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写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

毛泽东
风采

德，迥乎远矣。”

在《新唐书》中，毛泽东对徐有功有一段批注。徐有功是武则天称帝时的执法大臣。武则天当政时，任用酷吏，一时冤狱遍起，人人震恐，不敢直言。而徐有功耿直公正，不畏权贵，不计得失，执法如山，很有政绩，但也因此得罪有权势的人而被捕入狱。一次，在受诬陷、被罢官后而又被重新启用时，他给武则天写了一份奏折，说道：“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毛泽东对这种悲剧式的命运表示理解，但却不苟同徐有功的悲伤腔调，他批注道：“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靖、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毛泽东欣赏的是那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还有一位与徐有功类似的人物，就是武则天时期的正谏大夫朱敬则。他曾向武则天上奏章，以秦亡的教训，劝阻武则天“宜绝告密罗织之徒”。毛泽东在《旧唐书·朱敬则传》开篇的天头批注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给予朱敬则较高的评价。在谈到朱敬则给武则天分析秦亡教训的奏折时，他又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唐史中，还有一位毛泽东十分推崇的人物，就是唐玄宗“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姚崇。毛泽东在《新唐书·姚崇传》开篇的天头上用粗笔写道：“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曾给唐玄宗上过一道奏章，针对武则天以来的弊端，提出了施仁政、外亲和的十条意见，被玄宗采纳，因而才有了历史上的“开元之治”。毛泽东在姚崇提出的十条意见的天头上，批注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评价是十分高的。

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始终受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军事威胁。毛泽东读《宋史》，比较注重于军事经验的总结。

宋太宗赵炅，是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当时与宋朝对立的还有契丹和西夏。宋太宗曾亲率大军伐契丹。在阅读《宋史》对这场战争的记载时，毛泽东曾写过不少的批注，注意总结这场战争的经验教训。据记载，宋太宗伐契丹初期很顺利，沿途所到之处，地方官吏纷纷来降，然而毛泽东却看到了危险。他在天头上批注：“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果然不出所料，“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粱河，败绩。甲申，班师。”在此处天头，毛泽东批注：“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一

毛泽东
风采

语道破宋军失败的原因。后来，宋朝于公元 986 年再次派曹彬、潘美、杨继业等大军北上，最后各路大军仍因孤军深入而战败。毛泽东在此批注：“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元人脱脱在《宋史·太宗本纪》篇后写道：“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旁批：“但无能。”赞语又说：“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毛泽东在此批注：“幽州之败。”仅此一句，使溢美之辞不攻自破，表达了他对军事无能的宋太宗的轻蔑。他对契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战术的总结，我们常常能从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找到不少灵活运用这一战术的典范战例。

毛泽东读《宋史》、《元史》大致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据他身边的秘书在登记本上的一段记载：1962 年 9 月 20 日，毛泽东要《宋史》，我们送去《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11 月 23 日，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24 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二十四史》，还曾十分关心《二十四史》的标点和出版。1959 年 4 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写信给田家英：“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

四史，去年起就紧张地进行这一工作……现送上《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后来齐燕铭、范文澜、吴晗、金灿然等人建议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成。

“稗官野史也要读”

毛泽东阅读过大量的古代“正史”，但并不排斥和忽视正史以外的所谓“野史”、地方志书和历代文人的笔记小说。他曾说过：“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他认为：“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读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

《智囊》是明代冯梦龙所撰，该书编辑了明代以前的经史子传、野史笔记、演义传说中有关智谋的故事近2000则。毛泽东十分喜读这部资料丰富，且富于幽默的书。他的好友章士钊有一次带他的女儿去见毛泽东时，就让她给毛泽东带去一部线装本《智囊》，他知道毛泽东是十分喜欢这部书的。在这部书中，毛泽东的批注很多，从中亦可看出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上的一些特点。

毛泽东
风采

《智囊》卷3《上智部》中记叙：汉代冀州刺史朱博在巡视部属时，查出了一个教唆百姓聚众拦道，以试探上司本领的从事。于是他就把这个从事杀了。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批注：“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卷13《捷智部》中有一段描述王羲之幼年的故事：一日，王羲之在床上听到大将军王郭和钱凤在外商量谋反之事，为了保全自己，他便把唾沫抹在被上、脸上，装得睡死的样子。王、钱二人想起床上的小王羲之，怕事情暴露，想把他杀死。他们一看小王羲之的睡态，信以为真，就放心了。毛泽东看后，批注：“此事有误，待查。”对此事采取了很认真的态度。

卷14《捷智部》记载了明代鄞县人监生张恺，作江陵县令时，一次大军从江陵经过，要征集火炉和灶。他就让木匠把方桌的腿锯去一半，在中间挖一个洞，再安上锅，即成炉灶，很快完成了征派。不久，军中又征集马槽，他又叫各家的妇人用棉布缝成马槽形，再用木桩撑上。等马吃完草后，即可卷起来，便于携带。因为张恺的聪明，后被提升为工部主事。毛泽东很欣赏这个人，他批注：“小知识分子有用。”

卷19《语智部》记叙：孔子的门生子贡出入各国，几年间，便造成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

越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冯梦龙评论说：子贡所为，“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毛泽东赞成冯的看法，批注：“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卷22《兵智部》中有一段唐太宗的自述：“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说这就是“用孙子之术也”。毛泽东从军事学的角度写了大段批注：“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的右者，其次则是朱元璋耳。”他还在孙臏围魏救赵的故事上批注：“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我国有修地方志书的传统。毛泽东爱读史料丰富翔实的史书，因此能丰富地反映一个地方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各朝掌故的地方志书就成为毛泽东广泛涉猎的一个方面。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做调查。一天，当时任兴国县团委书记的萧华，在毛泽东的住处看到他正在仔细翻阅《兴国县志》。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毛泽东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来看。后来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书，

毛泽东
风采

在会议的间歇阅读。他还亲自挑选了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连同《华阳国志》印发给与会同志。3月8日，他又借阅楹联书10余种，在阅读中，他对孙髯所作的云南昆明大观楼长联甚为赞赏，并背诵如流。他还针对由清人梁章钜《楹联丛话》中对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的说法，批驳道：“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同年，毛泽东邀张治中去安徽视察。他一到安徽，就马上找来《安徽省志》阅读，使陪同他的张治中很新奇。毛泽东还多次到杭州，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名人的诗文集。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2000多首，从中选出200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给毛泽东一部。毛泽东接到此书后很有兴趣地阅读了这部手抄书。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他仍依照以往的惯例，要工作人员找来了1933年吴宗慈撰修的《庐山志》12卷。他常常是每到一地视察，总要先看看当地的县志，了解该地的山川风貌，丰富自己的见识。

历代文人的笔记杂志，也是毛泽东比较喜欢看的一类古籍。延安时期，一次，谢觉哉向毛泽东借书，毛泽东于1944年7月28日给谢觉哉写出一封信：

“《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可见毛泽东是藏有不少古代笔记小说的。这里提到的《明季南北略》是清初计六奇撰写的，一部记述明朝史事的随笔集。《容斋随笔》是宋代的洪迈撰写的，一部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及宋代掌故的笔记，深得毛泽东的喜爱。他借给谢觉哉的一部是乾隆时期的版本，后来这部书还进了中南海。1959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外出视察时，在指定所带的书籍中就列有：“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据当时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回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先后两次要这部书，一次是1966年11月，一次是1967年9月23日，到了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又几次要过这部书。

1971年，毛泽东生病，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将毛泽东喜读的一些书排印成大字本。《容斋随笔》也在其列。而这部书最具历史意义的是，1976年8月26日晚9时45分，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突然要秘书把《容斋随笔》找来。秘书很快从北京图书馆把书借来了。8月30日《容斋随笔》的大字本又印出，31日送到了中南海。可直到9月9日逝世，毛泽东再也没有看过

毛泽东
风采

任何一部书。在毛泽东一生读过的无数书籍中，这部本不十分有名的笔记《容斋随笔》，竟成为陪伴他走到人生终点的最后一本书。可见，毛泽东对称之为“杂书”的古籍是多么厚爱，也表明了他读书具有的独特志趣。

毛泽东是一位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家，他的书法笔走龙蛇，顿挫优游，极完善地抒发了他的个性气质。他的书法成就与他广泛研究历代书法碑帖是分不开的，书法碑帖可以说也是毛泽东爱读的“杂书”之一种。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休息时，经常阅览晋唐小楷法帖。1949年到苏联去时，他还随身带了一部《三希堂法帖》。1955年以后，毛泽东开始广置碑帖。毛泽东一直喜欢草书，他经常看的是“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等人的草书帖。1958年10月16日，他给秘书田家英写去一封信：“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从书体风格上分析，从这年以后，毛泽东的书法风格有很大的变化，运笔更加圆润，草字的使用也更加规范。这封信表明，从1958年以后，毛



泽东开始较为全面地研究和临习历代草书作品。

1959年10月，田家英等人向故宫博物院借了20件字画给毛泽东，其中有8件是毛泽东要的明代书法家的草书帖，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的作品。

田家英说过：“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体的，写起来很有气魄。”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多次要过怀素的《自叙帖》。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又要看怀素的《自叙帖》，并指示秘书，把他所有的书帖都放到他的卧室里。于是，秘书就把在北京和外地给他买的大量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法帖》、《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本）等，放在毛泽东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还在卧室外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1972年中日建交，毛泽东送给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两册书，一册是《楚辞集注》，另一册就是怀素的《自叙帖》，可见他对怀素的书法喜爱之深。

1964年，毛泽东又要秘书收集各家书写的《千字文》字帖。秘书为他收集了30余种，行草隶篆都有，而以草书为多，包括了王羲之、智永、怀素、张旭、米芾、康熙等，直至近人于右任的作品，他都一一仔细翻阅。

毛泽东
风采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会客室，摆放着各种图书。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样，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就静下心来经常练习书法。一天他听说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就叫秘书借来。他一看就爱不释手。

这本真迹毛泽东借阅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他拿着真迹逐字琢磨，有时还抓起笔来对照着练写，写到兴头，吃饭也叫不应。

一个月到了，毛泽东将“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卫士小尹，说：“送还吧，零点必须送到。”小尹回答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

在看，尽管多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摆摆手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一个月，朋友交往重信义。”书帖送还了，但毛泽东专心钻研书法的事情却留在了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记忆里。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段小插曲吧。

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古典文学

建国后，除了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书籍外，毛泽东阅读最多的，大概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了。毛泽东是政治家兼诗人，因此他总能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诗词歌赋中发现并赋予其现实性的深刻政治内涵，而他在建国后的许多由他亲手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常常会与一些古典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

读《离骚》，心中喜悦 毛泽东十分喜爱读屈原的作品。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在《讲堂录》中全文抄录过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战争时期，毛泽东较少涉猎屈原的作品，但他心中总难忘怀。

毛泽东
风采



1961 年，毛泽东在庐山查阅图书。

1949年12月，毛泽东与苏联的汉学家费德林有过一次关于中国诗歌的谈话，着重谈了他对屈原的看法，他称屈原为“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他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故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土地——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这番谈话，流露出毛泽东对屈原极为深情真挚的情感。1951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他的同乡老友周世钊时，说道，《楚辞》虽是古董，但却是历史，有读的价值。

毛泽东在建国后较为集中地阅读屈原的作品，是在1957年以后。这年12月，他让秘书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有关论著尽量收集给他，秘书给他收集了50多种。1958年1月12日，在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上，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

毛泽东

风采

《离骚》，有所领悟，心中喜悦。”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又让秘书在短时间内给他编了一本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后来，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了与会代表。1961年6月16日，他特别指名要两本书，一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由朱熹撰写的宋版《楚辞集注》，另一本是明代陈弟的《屈宋古音义》。这两本书是毛泽东十分喜欢看的。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外出视察时，总是把这两本书带在身边。

宋玉，相传是屈原的学生，曾创作过大量的骚体辞赋，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屈原的创作风格。毛泽东也十分喜爱宋玉的作品。他在1935年10月所作《念奴娇·昆仑》中有“安得倚天抽宝剑”一句，即从宋玉《大言赋》中“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一句而来。1956年作《水调歌头·游泳》，有：“更走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此语乃出自宋玉《高唐赋》中。而毛泽东对宋赋议论最多的，莫过于《登徒子好色赋》一篇了。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会见部分史学家、科学家和著名新闻工作者。在谈话中，他突发奇想，大段地背诵起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来。“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

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龀唇历齿，旁行踽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在这里，宋玉何以如此作贱登徒子？原来，登徒子曾是楚国大夫，他劝楚王不要带宋玉进入后宫，因为宋玉很好色。宋玉闻之大怒，即作此赋，在楚王面前辩解，反过来诽谤登徒子是好色之人。宋玉的这段反告很奏效，不只是当时，乃至以后的千百年里，人们一直把登徒子当做好色而品行不端者的同义词。毛泽东熟练地背诵完宋玉的这篇名赋后说道：“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手法。”他十分风趣地说：“从本质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好人。要了这样丑的女人，还能和她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照我们的看法，登徒子是一个爱情专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怎能说他是‘好色之徒’呢？”他认为，登徒子是蒙受了千百年的不白之冤，应当平反。而宋玉则是诡辩的能手，楚王则是不辨是非的昏庸之人。在这里，毛泽东的用意并不只是对一

毛泽东
风采

篇辞赋而阐发的一种新解而已，而是在借题发挥，以他十分熟悉的一篇宋玉的赋为例，来强调我们党的干部要克服和少犯片面性的错误，不要陷入诡辩术的泥淖之中去。领导者更不能轻信一些人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诬告之辞。由一篇文学作品而阐发出对现时代所具有的政治意义，这是毛泽东在长期用心读书中所培养出来的特有的解悟能力。

赋体诗发展到汉代初年，又出现枚乘、邹阳、严夫子等赋体大师，这些辞赋已是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汉赋。这些辞赋大多收入《昭明文选》一书中。毛泽东十分爱读此书。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组织“批彭”的紧张时期，突然想到了此书中的枚乘《七发》，他让秘书给每位与会者印发了《七发》全文，并在一次会议上对此文做了长篇解释。他说：

此篇（指《七发》）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

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旦夫出與入輦，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婚。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京堕窳……”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客曰：“今如太子有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谔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办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见效甚快。……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少时读过此文。40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出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

雨
风
来

同志。……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抬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书房。

毛泽东就像一位国文教员，对这篇汉赋滔滔不绝地发表着政治和文学上的双层解释，令在座惊然。尽管毛泽东这里是有所用意的，但抽去它的政治用意，

仍不失为对枚乘《七发》一文的绝好赏析评介，是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独特的视角体现出来的。

曹操“大手笔”，谢灵运“通篇矛盾” 魏武帝曹操，文韬武略，还很会写诗，毛泽东对曹诗颇为厚爱，他称赞“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

在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4种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其中毛泽东对曹操的诗有多次圈画。在那本《古诗源》中，毛泽东在“武帝”处用红笔画着两条重线。在书中的注文“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植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处，毛泽东逐字圈点，表示对注者观点的赞同。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是曹操的名篇，毛泽东在晚年很爱读这首诗，“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毛泽东经常抄写这些诗句，一方面练习书法，同时也表示出对此诗不信天命、自己掌握命运的朴素唯物论思想的欣赏。1961年8月25日，他在问候秘书胡乔木的一封信中写道：“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对曹操

毛泽东
风采

的另一首诗《观沧海》，毛泽东更是经常阅读，反复吟哦。他在好几本刊有这首诗的古籍中都做过圈点。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保健医生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岸沙滩上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他还找来地图，查证曹操当年在此地作诗的确切地点。他对工作人员说：“曹操在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时写出《观沧海》。”面对茫茫大海，同样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心情又怎能平静呢？就在这次北戴河之行后，毛泽东写下了他的名篇《浪淘沙·北戴河》：“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泽东曾对子女谈论诗词时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还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谈起曹操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在晋代诗人中，毛泽东比较喜欢谢灵运。谢灵运是晋代有名的文学家，淝水之战中名将谢玄之孙，世袭康乐公。他一生纵情山水，工诗善文，而在政治上始终不得志。《古诗源》里收有谢诗24首，在毛泽东收藏的那本《古诗源》中，对谢诗圈画了22首，书中编者评论谢诗的注释，如“一归自然”、“匠心独

毛泽东

风采

运”、“在新在俊”、“别绪低回”、“触景自得”等句，毛泽东都画着曲线和圈，表示对注者的赞同。尤其在—首《登池上楼》诗上，毛泽东加了大段批注：

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标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到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另外，毛泽东在《昭明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对收入的谢灵运的诗也作过不少的圈画。

熟读唐诗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这个时期，诗人辈出，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王、骆、卢、杨“唐初四杰”导其先声。在这四个人中，毛泽东最喜爱读王勃的诗。

他在读《新唐书·王勃传》时，就留有大量的圈点，对王勃的生平尤其留意。他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在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天头

毛泽东
风采

连画了三个圈，并精练地写道：“好。”他还特别欣赏王勃的《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次与子女谈论诗文，谈到兴头时，他即兴悬肘挥毫写下了此句。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读到一本《初唐四杰集》，他读之再三。在《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处，他画了一处大圈，然后写下了长达1000余字的批注。首先，毛泽东考证道：“王勃此文，是去交趾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应有二十三四了。”“《王子安集》90%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之地而已。”随后，毛泽东对王勃评价道：“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的一方……为文当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到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7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随后，毛泽东引申开来，发表了著名的长论：

毛泽东
风采

以一个28岁的人，写了16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24。还有李贺死时27，夏完淳死时17，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70%以上，都是他们干的。30%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由王勃的命运而联想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些普通规律，毛泽东的这种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深刻表达出内心的思想冲动。他同情弱者，“小人物”，认为他们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当“小人物”、青年人与权威者发生冲突时，毛泽东便不自觉地充当保护者。后

毛泽东
风采

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争论中，毛泽东就直接参与了进去，替“小人物”撑了一回腰。

在唐诗中，毛泽东曾说自己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他们的诗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毛泽东的偏爱也可以说是他个人性情的一种真挚流露。

李白自古有“诗仙”之称，毛泽东曾对李白有过一个总评价：“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在《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李白《将进酒》一诗上画有很多的圈点，并在天头上批注：“好诗！”他从这首诗中体会到了李白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和不畏权贵的思想感情。他还在《蜀道难》一篇上批注：“此篇有些意思。”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蜀道难》写得很好，艺术性很高，对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写得淋漓尽致，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他还认为：“对这首诗，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可见，毛泽东对李白这首诗的爱好主要侧重在艺术性方面。1959年，他在给子女的一封信中写道：“‘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



破闷的作用。”

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在晚年视力衰弱的情况下，叫人用寸楷抄录了李白的《梁父吟》，放在身边经常阅读，他还在一本 20 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唐诗别裁集》中对这首诗大量圈点。李白的这首《梁父吟》，写于他被排挤出长安之后，诗中用大量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来比拟自己的怀才不遇，而通篇又流露出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不甘气馁的乐观主义精神。当时全国上下正处于个人崇拜的最高潮，而毛泽东内心却处于身体老弱而又渴望战斗的激烈矛盾之中，从李白的这首《梁父吟》中，他找到了共鸣。

人称“诗鬼”的李贺是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是继李白之后又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虽身为皇室后裔，然而一生不得志，只活了 27 岁，留下了 240 余首诗。毛泽东在一长篇批注中，把中国历史上“英俊天才”而“惜乎死的太早”的人列了一个名单，其中就有李贺。李贺的诗歌继承了屈原辞赋的浪漫主义精神，激情奔放，语言瑰丽多彩，想像力十分丰富。这一点也正是毛泽东喜爱李贺诗歌的地方。

他藏有数种李贺的诗集，如《李长吉诗歌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每本书中都留有他大量的圈画。圈画较多的是《南园十

毛泽东
风采

三首》和《马诗二十三首》，其中《南园》中“男儿何不带吴钩？……”和“寻章摘句老雕虫……”两首诗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也被紧圈密点，可见毛泽东之喜欢。

毛泽东对李贺的诗很熟，在他创作诗词时，常有点化李贺诗句的句子。如1949年4月，他在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时，就直接借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改写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作于1950年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有句“一唱雄鸡天下白”，即出自李贺《致酒行》中“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而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写出了恍然如梦的浪漫意境，与带有强烈神话色彩而被后人称为“鬼才”的李贺的诗歌意境有很多相通之处。可见他对李贺诗歌的领悟是相当深刻的。

毛泽东在1965年写给陈毅一封谈诗的信中写道：“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这里似是一名专业研究者对李贺诗歌形式所下的一句断语。

解放后，一次，毛泽东请周谷城到中南海书房谈古论今。谈到兴头之际，周谷城随口背诵起李商隐的

《马嵬》，这是一首写安史之乱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背着背着，周谷城突然忘了最后两句，正在尴尬之即，毛泽东顺口接着背诵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周谷城暗自佩服毛泽东对李商隐诗之熟悉。

李商隐是晚唐诗人，他的许多咏史诗，笔触含蓄，寓意深刻。毛泽东十分喜欢李商隐的《贾生》、《北齐二首》、《隋宫》、《朝碑》等诗，他就曾不止一遍地圈画过。“锦瑟”、“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特诗篇，大多描述的是爱情生活，但又蕴含一些政治内容，极尽缠绵悱恻之情。毛泽东也十分喜欢李商隐诗中含意隽永的名句，如“相见时难别亦难”、“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句并做过大量圈画。他早年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可以说与李商隐的“锦瑟”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20世纪60年代，一次，毛泽东与刘大杰谈诗时，说：“《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在谈到李商隐的《贾生》时，毛泽东问：“能背得出吗？”当刘大杰背完后，毛泽东连连说：“写得好哇！写得好！”1976年2月，毛泽东与刘大杰的一次通信中，又认为“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此时，是他逝世前的几个月，仍在谈论李商隐

毛泽东
题

的诗作，可见他之喜爱！

“三李”之外，毛泽东是“不甚喜欢”杜甫的，但他并不完全排斥杜甫。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就留有不少杜诗的集子及大量批注杜诗的墨迹。据初步统计，毛泽东批注过的杜诗大致有 67 首。

早在 1923 年，毛泽东作《贺新郎》一词送给杨开慧，原稿中有句“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其中“江海客”一词即引自杜甫“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1937 年毛泽东在延安与一些同志谈论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的序言时，即发表看法：“认为杜甫的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艺术与书法艺术的共通之处。”1958 年成都会议时，毛泽东让秘书从杜甫草堂借来的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有 12 部 108 本之多。他饶有兴致地浏览，并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一次，他在与文学史家刘大杰谈话时，问刘的籍贯，当听说是“岳阳”时，他即信口吟道：“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这是杜甫《登岳阳楼》中的名句。后来他在视察途中经过岳阳楼时，又即刻挥毫手书了杜甫的这首诗。见岳阳楼便联想到杜甫的相关诗句，可见此诗给毛泽东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1965 年他在写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十分推崇杜甫的律诗，说：“诗要用形象思维，

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到了晚年，在不能看书的情况下，他让护士给他读诗，当护士读到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时，他为之动容，赞道：“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之事，毫无雕琢之工。”

毛泽东在与别人谈到李白与杜甫时，往往并称“李杜”，认为同是“大诗人”。后来，毛泽东有扬李抑杜之意，是因为他感到杜甫的诗常为封建保守思想的文人推崇、利用。相比之下，李白张扬个性的思想往往不被容于封建社会。故在毛泽东看来，这与李白的成就是极不相称的。后来，郭沫若依照毛泽东的意思，写了《李白与杜甫》一书，书中大多数观点是郭氏自己的见解，想必其中许多具体的看法毛泽东都会赞成。

白居易，是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之一。他的“新乐府”诗歌，为毛泽东所推崇。在毛泽东的一本藏书《注解唐诗三百首》中，他读完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后，满怀感情地写下了这样的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

毛泽东
风来

处，其然岂其然乎？”对白居易的诗歌特点，一语道破。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痛定思痛，即吟出了白居易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篡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表达出他对林彪背叛行径的感慨之情。在晚年，毛泽东常让护士读的诗中，就有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

1958年，刘少奇在一次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认为唐代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可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贺诗写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然而毛泽东对此持有疑义。经过一番考证之后，毛泽东于1958年2月10日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专就此事谈了自己的看法。

少奇同志：

前谈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绍兴辞归会稽（绍兴），年已86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

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好友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融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 90 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像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1958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0 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 24），亦无不带家属之记

毛泽东
凤来

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由一首短诗而引出的一项古代官制，毛泽东翻阅了《全唐诗话》、《新唐书》、《旧唐书》，并写下了这篇长信。细心考据，近乎一位职业文学史家的评论，这不能不让人们佩服其刻苦的精神和广博的知识。



毛泽东阅读过的《资本论》、《旧唐书》等书籍。

1975年春天，已入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和一位叫芦荻的同志交谈中，毛泽东问：“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接着，他就脱口吟诵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原来，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含有来者的姓名。毛泽东以自己的博闻强记，与来者幽默了一下。他还特别喜欢刘禹锡的另一首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他在这首诗的标题处特意用红铅笔画着圈，特别欣赏此诗中的两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书中用重线画于其下。他认为这两句话表现出一切事物都在变幻中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对旧注家的评论：“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则大不以为然，他批注道：“此种解释是错误的。”刘禹锡有一篇《天论》，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

毛泽东还十分爱读刘禹锡的一些咏史诗，对《蜀先王庙》一诗，他批注：“略好”，而《乌衣巷》一诗，他先后就圈画过六次。

毛泽东
风采

说韩道柳 唐代的韩愈，世称“文起八代之衰”，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青年毛泽东在学习古文时，曾听从老师的建议，专攻韩文。那时，他从旧书店买来一套《韩昌黎全集》，反复研读。他的《讲堂录》中有许多是读韩文的笔记，所涉及的作品有十几种之多。那时他的许多文章，都带有浓厚的韩愈笔意。到了延安，毛泽东还与丁玲等延安文艺工作者一起谈论过韩愈。

解放后，毛泽东仍喜爱阅读韩愈的散文。1965年8月，他曾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一部《韩昌黎全集》。这部书是由唐代的李汉编辑的。在毛泽东所读过的一本《新唐书》中，有一篇“李汉传”，叙述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子妻之”。毛泽东批注道：“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可见，毛泽东对《韩昌黎全集》的编辑流传情况很熟悉，而且评价相当高。也是在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文学史家刘大杰时，再次称赞韩愈的文章写得好。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评法批儒、扬柳抑韩的浪潮中，刘大杰修改了自己在1958年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中否定韩愈的观点，提出“韩愈虽非法家，但也并不是醇儒”的新看法。他

毛泽东

风采

就韩文详加分析，并给毛泽东写去了一封信，提出了关于韩愈的新观点。毛泽东很快复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关于韩愈的诗，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1965年7月写给陈毅的一封谈诗的信中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毛泽东对韩愈的世界观不赞同，但对他的诗文可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

柳宗元是继韩愈之后的又一位散文大家。毛泽东是比较推崇柳宗元的，其重要原因是因为柳宗元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封建文人。1959年3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柳宗元的诗》一文，毛泽东读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接见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又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说》，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毛泽东对柳宗元的喜爱，还集中表现在他关心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一书的出版之事上。章士钊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一生酷爱柳文。从1960年起，他着手撰写介绍柳文的书。在与毛泽东的一次会面时，章士

毛泽东
风采

钊谈到了自己的书稿。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他表示，自己也十分喜欢柳文，希望章士钊把书稿写完后送他先读。到1965年，章士钊完成了上下两部100万字的《柳文指要》，他即将手稿下部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部书稿，还亲自修改了若干处。1965年7月18日，他给章士钊写去了一封信。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判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

尽管毛泽东看出了这部书在思想方法论上存在着缺陷，但他仍流露出对此书的欣赏，并表示赞成出版。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又从侧面评说了章士钊的这部《柳文指要》。他认为这部书“颇有新意”，“大抵有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

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主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看法是鲜明而统一的。但康生看过此书稿后，却从中作梗。他要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原稿重做修改，方可出版。毛泽东得知后，即给康生写去一封信，表明自己赞成出版该书，康生才不得已而同意。

此书稿送到中华书局不久，“文化大革命”狂风骤起，康生再次出面干预，《柳文指要》一书的出版又被搁置。1970年，章士钊于激愤中，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道：“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显然，章老先生是说气话了。

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又一次过问此事，最终促

毛泽东
风采

成此书于1971年出版。

毛泽东对柳宗元的喜爱，到他的晚年还依然如故。此时，他尤其赞赏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到了1974年开始的“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更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时，毛泽东之喜爱柳宗元，已不纯粹是从文学的角度或古代哲学史的角度了，而是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用做宣传反对“复辟”，提倡“法治”思想的工具。由文化意义上的评判而发展为政治意义上的“批判”，这是毛泽东晚年谈论文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不废婉约，偏于豪放” 关于宋词，毛泽东的观点是“不废婉约，偏于豪放”。1963年2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到：“轻音乐是抒情的，重音乐是战斗的。”毛泽东插话道：“那战士就没有抒情？诗、词也是一样。在同一朝代，如宋朝，有柳永、李清照一派，也有辛弃疾、苏东坡、陆游一派。柳李的作品讲爱情。”

在宋词中，毛泽东圈画得最多的，是辛弃疾的词。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早年参加过抗金义军，后遭主和派打击，长期不得志，因此他的词，大多抒发了对往昔战斗岁月的追忆和年老壮志未酬的苦

闷，这种情绪正与晚年毛泽东相暗合。他有一部 1959 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稼轩长短句》，共 4 册，每册封面上，他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读过的圈记。书中的名篇，布满了圈点、曲线等。在他经常翻阅的几部《词综》里，对辛词也多次圈画。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等词，是他充满爱国主义词篇的代表作，毛泽东非常喜欢，曾多次圈画过这两首词。辛弃疾还有一首《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抒发了自己对往昔战斗生活的怀念，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心中的苦闷，毛泽东对这首词至少圈画过两次。还在一本《词综》中，在这首词的“列槛耸层楼”一句处，仔细地把错印的“槛”改为“舰”。1964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等人谈哲学科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大仪斡运，天回地游’。”他认为，这些诗词里都包含着地圆的意思。后来，毛泽东让秘书查找辛弃疾的这首词给他。这首词就是《木兰花慢》，其中写道：“可怜今昔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可以看出，毛泽东读辛

毛泽东
风采

词是相当用心的。

在豪放派诗人中，毛泽东还圈画过苏轼的诗词多首。他在1949年5月与柳亚子的一次晤谈中，提笔书写了苏轼的名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陆游是南宋著名诗人，毛泽东读过不少他的作品。一次他问邵华，喜欢陆游的哪首诗词，邵华列举了《关山月》、《书愤》、《示儿》、《夜游宫》等。毛泽东听后兴致很浓，当场挥毫写下了《夜游宫》。他于1961年12月作《卜算子·咏梅》时，即在短序中写道：“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原来，陆游在写《咏梅》一词时，因晚年不为所用而心境不好，故词也写得凄凉抑郁：“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因时代与心境的不同，毛泽东却改写道：“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他不同意陆游的消极，但仍借用其词的原调原韵，可见他对陆游词是相当喜欢的。

毛泽东曾对萧三说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就摆放有宋朝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的《乐章集》。在这本词集和《词综》里，

毛泽东
风采

毛泽东圈画过的柳词有 35 首。柳词有首《鹤冲天》，反映的是作者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毛泽东在此标了一排密圈，表示理解作者心情。柳永的代表作《望海潮》、《雨霖铃》等词，毛泽东也都相当喜欢。但圈画得比较多的，是《乐章集》中的三首《满江红·桐州》。

毛泽东还特别喜欢李清照的一首《醉花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写得凄婉哀怨。凡载有这首词的集子里，都留有毛泽东圈画过的痕迹，可见他是反复读过这首词的。

从自己喜欢的风格来说，毛泽东是侧重于豪放派诗词的，但从一些圈画过的婉约派词来看，尽管数量不大，但毛泽东还是做到了“不废婉约”。

查找两首诗 毛泽东曾记过很多古人的诗词，但当想不起或不甚清楚某首诗词时，他都一丝不苟地查询，直到知道为止。为此，他往往要翻阅很多书。

1961 年 11 月 6 日上午 6 时，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突然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去一封信：“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林逋是宋代归隐诗人，被世人称之为“梅妻鹤子”。

毛泽东
风采

林逋的诗文集很快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手里。这天上午8时半，他给田家英写去了第二封信：“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查一下。”

就在田家英为他查找之时，这天，毛泽东给他写了第三封信：“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楼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代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很快，这首诗被查明了。该书为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升。”这天，毛泽东手书了这首诗，并写上：“高君，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早在1957年，毛泽东与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过：“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大概正是这首《梅花》给毛泽东留下了好印象，只是后来他记错了作者。



1961年，毛泽东在读书。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又一次要田家英查诗。他在信中写道：“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得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人

毛泽东
风采

所作。望你一查告我为盼！”在信后，毛泽东书写了他记忆中的《三垂冈》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河。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又特别注明：“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不一会儿，田家英查出了此诗乃是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对照严遂成的《海珊诗抄》，发现毛泽东只记错了两个字，第四句“连城犹拥晋山河”中的“犹”应为“且”，第七句“萧瑟三垂冈下路”中的“下”应为“畔”。

然而，后来人们在翻看袁枚的《随园诗话》时，却发现此书卷二也引了这首《三垂冈》，所记的第四、七句正与毛泽东所记忆的一模一样。《随园诗话》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本诗话，也许毛泽东是从这本书中背诵下《三垂冈》这首诗的。这样看来，毛泽东的记忆是没错的，只是这首诗的出处不同而已。

“还是旧的民歌好” 1965年7月，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提到：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

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泽东十分重视民歌的成就，他读过很多古代的民歌。《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是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他随口吟诵道：“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接着，他说：“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毛泽东将《诗经》视为“老百姓的民歌”，总结它的主要特点是“反对统治者”。

《古诗源》是清人编的一部诗歌集，里面收了很多民歌。毛泽东十分爱读《古诗源》，在他的卧室和书房里，各有一本《古诗源》，可随时翻看。对其中一首苏伯玉妻作的《盘中诗》多次圈画，并在一本《古诗源》里此诗处批注：“熟读”。《上邪》是一首汉乐府歌辞，被收入了《古诗源》。全诗很短，毛泽东在这首民歌的标题处画了三个圈，还在“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复雨雪，天地合”处，分别标着1、2、3、4、5，明确点出作者罗列的表达爱情决心的

毛泽东
风采

5种违反自然的现象，毛泽东很赞赏诗人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1962年6月，他在写给病中的邵华的一封信中，叮嘱她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其中，就提到要她多读《上邪》，希望她坚强些。

毛泽东对一些民歌记得很牢。1936年底到1937年初，他在读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曾信手用《南宫词记》中的一句民歌批注于书中：“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以表达他对于否定之中有肯定之两者的密不可分关系的理解。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说，叫别人写，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用耳学。他又说一例：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他还背诵了北朝《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尽管他在谈话中申明：“当然我不是反对扫文盲”，但他的欣赏倾向显然是推崇非文化人的不雕饰、直抒胸臆的诗歌风格。

毛泽东喜爱古代的民歌，同时也希望新时代的民歌有较大的发展。1957年1月12日，他在约见袁水

拍、臧克家时，与这两位新诗诗人谈了民歌从四言到七言的发展过程，谈了对新诗发展的看法，他认为“新诗，应该精练，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他还明确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同时他在写给《诗刊》编委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到了1958年，他号召各地方注意收集反映广大人民创造热情的民歌。他的创造新诗体的宏愿没有在“大跃进”的年代实现。后来，他在读到郭沫若、周扬精心编选的《红旗歌谣》时，评价说：“水分太多，还是旧的民歌好。”

他期待着一种既朗朗上口，又感情真挚，还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新体诗歌”的出现。但他在生前，一直没能读到这样的作品。

晚年读《枯树赋》 《枯树赋》是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的作品。诗赋中充满英雄暮年的凄凉情感，反映的是一种在自然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

1951年，毛泽东得知其子岸英牺牲的消息后，久

毛泽东
风采

久地凝望着窗外的枯柳，低低地吟起了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
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然后，他默默地自语：“开慧，岸英和你一样，是为革命、为人民牺牲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你们……”

毛泽东晚年，经常充满感情地吟诵这首诗赋。1975年5月29日，毛泽东让芦荻读了此诗赋，然后说：“我的腿病很久了，不能走路，不断地要锻炼它，战胜它，可是很困难啊！”在两名医务人员的搀扶下，他站了起来，在书房里吃力地走了三圈。此时此刻毛泽东再次吟诵《枯树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为了便于阅读，毛泽东让人印出大字本的《枯树赋》，仅1975年5月29日至8月中旬，毛泽东三次吟诵过这首诗赋，并谈过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说：“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的，远不只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庾信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进来，眼界宽广，思路宽阔。”

毛泽东特别对全赋以殷仲文“顾庭愧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起兴，恒温的“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作结的手法，赞叹不已。他说：“这两段话不仅是全赋的‘纲’，是画龙点睛之笔，而且起结呼应，使全赋有一气呵成之势，突出了主题，又余韵不尽。”



毛泽东习惯睡木板床，并习惯躺在床上看书。在这张普通的木板床上，放满了整整半床的书籍。

毛泽东逝世前的几个月，又多次读《枯树赋》。他让人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

毛泽东
风采

他说自己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诗，但他仍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极富有感情地念出：“……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稍许，他又让人看着书，慢慢地背了第二遍。毛泽东生前这段日子，常常想起来就吟诵这首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

《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在封建时代末期达到的一个高峰，它的作者是清乾隆时代的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几百年来，人们对《红楼梦》做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者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后来胡适、俞平伯、王昆仑、周汝昌等学者都对《红楼梦》做过大量研究，从而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

毛泽东初读《红楼梦》，要晚于《水浒》和《三国演义》，但后来他却异常重视这部书，尤其是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特色，很是得到毛泽东的称道。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红楼梦》，尤其注意这部文学名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毛泽东

风采

和社会矛盾，认为它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1961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此后不久，在1962年1月的一次扩大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年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而在一次与王海容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把《红楼梦》作为那个时代的生动代表，是毛泽东给予《红楼梦》的极高评价，这也正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具有比其他“红学家”更为恢宏的理论气魄。最能反映毛泽东对《红楼梦》看法的，是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对吴江、龚育之等几位哲学工作者所发表的一番议论。他说：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

毛泽东

风采

读。什么人都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做社会历史书来读，读得很细，还经常就这部书中反映出的社会各方面加以剖析，挖掘出其中细致而有价值的内容来。他还从这部书中看出了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问题的某些内容。他曾说过：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肠，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

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他还注意到《红楼梦》里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家长制的动摇。他说：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钱。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毛泽东用敏锐的目光从《红楼梦》中搜寻出他印证中国封建社会各种各样的复杂现象的史料。

然而《红楼梦》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毛泽东也没有因为把它当历史来读，而忽视它的文学价值。相反，毛泽东曾十分欣赏《红楼梦》人物塑造的生动和语言的丰富多彩。

毛泽东对曹雪芹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十分赞赏。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称赞王熙凤有战略头脑，“王熙凤处理‘尤二姐事件’，真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讲到“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一章时，他说：“你看，她把个贾瑞弄得死而无怨，至死不悟。”他风趣地说：“王熙凤是当内务部长的材料。”而在1973年7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对《红楼梦》的评论，可以看做是他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书的人物描写，他

毛泽东
凤来

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他还推荐在座者去看看书中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的那几段描写。

毛泽东还把《红楼梦》与《金瓶梅》相比较。《金瓶梅》也是一部谈“风月”的古典小说。它描写了比《红楼梦》时代稍早的明朝社会。毛泽东很重视这部书，在1961年12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向与会者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遍。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但是他还是较为偏爱《红楼梦》，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

尽管毛泽东十分推崇《红楼梦》，但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作者曹雪芹的局限。他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

毛泽东不仅爱读《红楼梦》，而且还十分关心

《红楼梦》的研究状况。他曾在1964年8月在北戴河接见几位哲学工作者时，谈到他对《红楼梦》研究的一些看法，他说：“《红楼梦》写出200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而在讲这番话的10年以前，毛泽东曾亲自发动过一场反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红学研究的运动，这场运动以《红楼梦》研究为契机，却波及了当时的整个文化思想界。

1954年，有两位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他们曾将此文给《文艺报》，被置之不理，于是他们拿到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发表了。有人希望《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以期引起争论，又被一些人以“这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为由拒绝了，后来只得在《文艺报》上转载。不久，这两位青年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和《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红学研究的两部代表作。李、蓝在文章中批评了俞平伯红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毛泽东
风采

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两篇文章，并从中发现了符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思路。他在这两篇文章里画满了杠杠、圈点和问号。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作者的名字下，他批注：“青年团员，一个22岁，一个26岁。”尽管他对这两篇文章有某些不同看法，他曾批注有：“这一点讲得有缺点”，“这里写的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等。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是肯定作者观点的，对这两位青年人敢于向学术权威挑战的精神表示赞许。而引起他不满的是有关报刊对这两篇“小人物”的文章所采取的压制态度。于是，他在1954年的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在这封署名的信中，毛泽东首先叙述了李、蓝两位青年作者文章发表的曲折经历，然后写道：“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他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他高兴地写道：“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



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这是毛泽东在解放后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所做的一次重大努力。他选择了他十分关注的《红楼梦》研究作为突破口。于是这场针对《红楼梦》研究领域内的斗争扩大到当时的整个文化界、思想界，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斗争由对研究方法的批评而逐渐扩大到对思想、理论的批判。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有必要开展这场运动，但对俞平伯等一些老学者的过火批判，由一场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这对建国以后我国学术研究自由争鸣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是，毛泽东渴望《红楼梦》研究能有一个更大的飞跃，这种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发现了大量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的史料，并广泛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正常学术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可以说，20多年前，毛泽东期待把《红楼梦》“搞清楚”的愿望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实现。

毛泽东
风采

主编《不怕鬼的故事》 毛泽东爱读清代蒲松龄

鬼神小说集《聊斋志异》，称“《聊斋志异》可以当做清朝的史料看”。1959年4月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了《聊斋志异》中的《狂生夜坐》一文：“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所以我们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都不怕。”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亲自从《聊斋志异》中选了部分故事，印发给与会者。他要向人们提倡一种主动出击的“打鬼”精神。从《聊斋志异》中得到启发，他后来指示有关部门从古代人鬼作品中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不久，中央书记处找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把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任务交给了他们。编选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何其芳起草了此书的序，交毛泽东审阅。

1961年1月4日，何其芳被召到中南海。毛泽东对何其芳说，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何其芳等人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

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毛泽东要求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毛泽东为《不怕鬼的故事》序文修改了三次。他在修改中写进了这样的句子：“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毛泽东又写道：“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他还写道：“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他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需要打鬼，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的出版就显得更有必要。”这也许就是毛泽东从《聊斋志异》中得到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启发。

反复阅读 艰辛探索

1949年3月，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来武装那些即将开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干部的头脑。经他提议，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干部要学习 12

毛泽东
风采

本马列主义著作。当时，由胡乔木起草了这 12 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审定了这个目录，并在其目录的前面，题写了“干部必读”四个字。这 12 本书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等。这套封面印有“干部必读”字样的丛书在以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教材。毛泽东无疑是这套“干部必读”的忠实读者。

1953 年以后，新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而，党的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1954 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二篇》等著作。结合中国的实际，毛泽东带领全党同志较好地处理了解放初期的“三大改造”，使千疮百孔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年的 11 月 18 日，他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人民日报》11 月 13、14 日载有苏联新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 22 条的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

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中直接论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都较少，因此，毛泽东此时十分注意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此以后，他多次细心研究过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从中吸取建设中国的宝贵经验。由于苏联当时就存在着冒进超前的思想，在这些著作中也有相当的反映。这些必然给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索带来某种程度的消极影响。

1958年“大跃进”的出现，就是我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次重大失误，它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并给各级领导干部造成了相当大的思想混乱。这时，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又开始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这本书他曾经先后批注了4个本子，在批注中，他着重研究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对于该书中斯大林概括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五条，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对书中斯大林批评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观点，毛泽东表示赞同，他写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而对于斯大林认为商

毛泽东
风采

毛泽东
风采

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毛泽东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批注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毛泽东的这些独特见解，在当时还相当缺乏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的情况下，具有相当高的理论价值，可以说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的某些基本理论。后来，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讲话中，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说：“现在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即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利用和发展商品生产。为了换取农民产品，就要跟他们做买卖，商品生产不是缩小，而是要发展。废除商品，对农民的产品实行统一调拨，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后来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发挥了作用，这是他读书善于独立思考的结果。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当时读书的一些体会，并向他们推荐。信中说：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題，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

毛泽东
风采

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不久，1959年7月开始的庐山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把“读书”列为上庐山开会的中央委员会、省委书记要做的第一件事，读的书就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

1959年底，由毛泽东倡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先后组织了读书小组，主要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组织的这个学习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参加。从1959年12月10日开始，他们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进行学习，采取了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学习讨论，到1960年2月9日结束。在此期间，毛泽东围绕这本书，广泛发表了他对阅读马列主义书籍的看法。他说：“马克思主义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1959 年底，毛泽东和读书小组在杭州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由于当时还缺少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专著，所以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党的干部看这本书，然而这并不表明他完全赞同这本书的所有观点。相反，在这期间的多次谈话中，他都表达了对这本书的许多不同看法，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可贵探索。

毛泽东曾说：“这本书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

毛泽东
风采

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对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批评道：“教科书说‘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他又说：“教科书只是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没有讲它们之间的矛盾。”“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在作了大量的分析性的批评以后，毛泽东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给予这部书一定的肯定。他说：“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他还说：“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

高明。他死后修改本，内容上删除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议论。”这里道出了为什么他一再号召大家学习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原因。

毛泽东还由此谈到了他对撰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看法。他说：“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40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他还说：“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他殷切希望“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

此后，在繁重的政务活动中，毛泽东不仅自己坚持阅读马列著作，他在视察祖国大江南北的途中，始终把马列著作带在身边，而且他还不间断地督促全党

毛泽东
风采

的干部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1963年7月11日，他在中南海召集中央主管宣传教育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问题发表谈话时说：“要读几本、十几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办法引起中高级干部读书。”他还提出：“书目中还应包括普列汉诺夫的著作。30本书要出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他满怀希望地说：“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200个干部真正理解马列主义就好了。”8月4日，他又给周扬写信，细心地嘱咐：“印马列著作大字本，封面不要用硬纸，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应分装四本或八本，使每本减轻重量。”这一考虑是为了便利一些老同志阅读，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1965年12月，毛泽东又重提为马列著作写序、作注释的事，他召来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到杭州进行此项工作。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然而这一工作刚刚开始，就被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但毛泽东为马列主义著作在中国的普及所花费的心血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



读英语书籍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很少踏出国门，也不懂外语。但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掌握外语的重要性，十分有意思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与苏联友好，俄语是学校中的第一外语，而毛泽东却开始学习英语，学习英语成为毛泽东建国后读书生活的一个部分。

毛泽东是在1954年11月开始跟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学习英语的，最初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等杂志及一些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等入手，以后又逐步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等英译本。此外，毛泽东还读过一些马列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在学习这些马列经典著作英译本时，毛泽东曾遇到不少困难，因为这些马列著作大多是哲理性很强的作品，其中英文生词也很多。但毛泽东不畏困难，他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毛泽东阅读这些英文读物，是为了学习语言，所

毛泽东
风采

以他反复阅读,《矛盾论》英译本他先后学习了三遍,阅读的时间分别是:1956年5月10日、1959年10月31日、1961年10月9日。其他英文读物也是阅读多遍。毛泽东读书有个习惯,就是爱在书上加批注。阅读这些英文读物也不例外,不过不是写感想,而是写一些单词或短语的中文意思,以帮助学习。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中,他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释。他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一丝不苟地学习英语。

学英语离不开字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是英汉字典,一部是汉英字典,有时外出视察工作,他也带上这两部字典。为了更好地学习英语,自1961年至1964年,他又多次要过一些英文类辞书,如《英华大辞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汉英字典》(美国出版)、《英汉字典》、《现代汉英辞典》(王云五校订,王学哲编辑)、《中华汉英大辞典》、《综合英汉大辞典》、《汉英分类词汇手册》(北京外国语学院编)、《汉英时事用语词汇》、《世界汉英字典》(盛谷人编,1935年版)、《英汉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1939年版)等。但毛泽东对这些辞典、字典都不甚满意,曾希望能出版一部更为实用的汉英辞典。

毛泽东也阅读过一些英语学习教科书，如《基础英语》之类，1961年到1964年期间，他还先后阅读过《初中英语》、《中级英语》课本，《英语学习》杂志，外语学院编的《英语》修订本，北京大学英语系编的《英语教材》和《英语语法》等书。

毛泽东学习英文与其说十分刻苦，不如说他把这种特殊的学习当成是休息。



1957年，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他经常在入睡前，早晨起床时，饭前饭后，甚

毛泽东
风采

至在爬山散步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学习一阵儿英语。他在国内视察工作期间，在火车上、轮船上，都随时拿起英语书看上一会儿。1958年9月10日至21日，他巡视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途中十分辛苦，但他学习起英语来仍很有精神。

令人难忘的是，即使在飞机上的短暂时间毛泽东仍抽出时间学习英语。据他的秘书回忆，1957年3月19日，他由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书写了元人萨都刺的《徐州怀古》后，即学英语。

在外事活动中，毛泽东学英语的劲头更大。1957年11月，毛泽东二赴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在会议期间，毛泽东英语学习没有中断过。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先后会见非洲12国、拉丁美洲8国的4批外宾，多次以学英语作为休息。同年5月27日，他在上海会见了蒙哥马利元帅，两人会谈十分融洽，休息时，毛泽东就读起了英语。

尽管毛泽东的英语学习未能达到很高水平，但作为新中国的领袖，一位饱读中国史书、古典诗，同时又深研过马列著作的老人，仍能专心致志于英语学习，既体现了毛泽东读书的独特趣味，也向世人展示了他读书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对自然科学的关注

为了更好地掌握改造旧中国的思想武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把注意力和兴趣较多地投向政治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对于自然科学则缺乏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对自然科学就漠不关心和一无所知。作为一位求知者，他在博览群书的一生中，曾对自然科学多方涉猎，并以一个思想家敏锐的目光，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力图对他所接触的自然科学理论作出解释。在青年时期，他曾阅读过一些科学书籍：一本生物学家亚瑟·托马斯的著作，他曾读得十分入迷。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他又以政治家的气魄，积极地鼓励中国的科学家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从而实现中国的强国之梦，并与这些科学家建立了友谊。毛泽东一生十分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他的哲学思想也不时地在这一领域闪烁其光芒。

李四光是一位对新中国地质工作有着巨大贡献的地质学家。他曾不止一次地聆听毛泽东关于地质研究的看法。毛泽东对地质学知识的好学精神，曾使李四光感叹不已。

毛泽东
风采

在1952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见到了李四光。在谈话中，毛泽东突然向李四光询问：“山字型结构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十分惊讶。“山字型结构”是地质力学中的一个专门概念，不知毛泽东是从哪本地质书中读来的。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把李四光、竺可桢和钱学森请到中南海，在自己的卧室，与这三位科学家就天文、地质、尖端科技等重大科学问题进行了亲切而广泛的交谈。李四光回家后，对家人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自然科学津津乐道的毛泽东的生动形象。

1969年5月19日，李四光作为被接见的学习班的代表，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走上前来，拉着李四光的手，亲切地问道：“李四光，身体好吧。”接见完毕，毛泽东与李四光在休息室里又畅谈起来。他们谈起了多少亿万年前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生命起源。在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



拉普拉斯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李四光说：“我很想看看你写的书，希望能给我找几本。另外，还请你帮助我收集一些国外的科学资料。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李四光问。毛泽东用手在面前划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李四光给毛泽东送去了他写的《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后来，李四光为了节省毛泽东的阅读时间，决心自己亲自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各派观点都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整理完一套七册的资料，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不久，这七册用大字排版的地质学资料书就摆到了毛泽东的书桌上。在放大镜下，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套虽经一再精选和注释，但仍十分专业的地质学术书籍。当时，毛泽东已经 77 岁高龄。

在毛泽东关注的自然科学中，有一门专门研究生命的新学科：遗传学。在遗传学研究中，曾出现过摩尔根学派和苏联李森科学派之争。20 世纪 50 年代的苏联，却错误地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用

毛泽东
风采

行政命令手段压制从西方发展起来的摩尔根学派，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遗传学”，把基因学说说成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捏造”。这种不良的风气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20世纪50年代，我国一所大学里发生了一起粗暴对待一位摩尔根学派的研究者的事件，引起一些自然科学家的不满。

毛泽东带头抵制了这种不良风气。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在毛泽东一系列讲话精神的推动下，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者各抒己见，会议充满了民主的气氛。1957年4月29日，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了遗传学家李汝琪的文章《从遗传学说谈百家争鸣》，毛泽东十分重视。30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他还亲自代《人民日报》拟写了编者按语：“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

毛泽东

风采

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做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毛泽东把这篇文章的题目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1974年，毛泽东已重病在身。一次王震去上海，毛泽东就托王震代他向遗传学家谈家桢询问：“这几年为什么没见到你发表的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还是正确的嘛！”他继续鼓励我国的遗传学家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遗传学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自然科学的巨大作用，尤其是那些具有实用性的自然科学。

1960年1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机床技术革新的研究文章《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毛泽东很快看到了这篇文章，并表示了极大兴趣。他指示《红旗》杂志加以转载，并代杂志社给作者写去了一封信：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
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
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

毛泽东
风采

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0年12月16日

这封信给作者们很大的鼓舞。很快他们又写出了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想必毛泽东一定又饶有兴味地阅读了。

尽管当时所设想的机床发展方向未必符合今天的实际，但毛泽东竟那么细心地关注一个有关机械技术问题，不能不令人感慨。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篇讲话中谈到他对农业科学化问题的看法，表明他对这一领域的著作有过较多地关注。他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

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在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不只是对于农业毛泽东如此热心。据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回忆，毛泽东曾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用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有时间就动手试验一下。一次，化学家李烛尘陪他外出，他就向李烛尘学化学，并记过许多化学分子式。1958年7月，中南海瀛台曾搞过一次机械展览，毛泽东经常去看。回到住所后，他就让秘书找来《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两本书来读。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毛泽东就要来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来看。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各大工厂掀起了科技革新的热潮。此时，数学家华罗庚出版了《统筹方法平

毛泽东
风采

话》一书。该书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统筹学的方法。他给毛泽东寄去了一本。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发奋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华罗庚又在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华罗庚，他亲切地握着华罗庚的手，并向在场的领导同志热情地介绍：“这是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

1974年5月30日清晨6时，回中国访问的物理学博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得到通知，毛泽东将在中南海约见他。一个小时后，李政道见到了年迈的毛泽东。令李政道惊讶的是，他们一见面，毛泽东就直言问起物理上的对称问题。

毛泽东认为，社会进化是以革命为基础的，它是动力学，而不是静力学。他还坚信，这一思想在自然界也是绝对真理。他对具有静态概念的对称何以在物理学上占据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大惑不解，他问李政道：“对称何以那么重要？”

李政道向毛泽东解释了韦伯氏大辞典中关于对称的解释：对称指“平衡的各个部分，或平衡的各个部

分产生的形式美”。他还做了一下试验：他用手指把一支平放在纸上的铅笔弹向一方，然后又往回弹了一下。他指出：这个过程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但在整体上它具有对称性。

毛泽东对这个简单的试验很感兴趣，又追问道：“对称的深层意义是什么？以对称原理为基础，真的能够表达宇宙法则吗？”

李政道向毛泽东解释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用平衡原理为必要条件，以对称为基础而创立的。他又与毛泽东讨论了粒子与反粒子的对称，以及由此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后来李政道回忆说：“对称的美如此简单，其结果又是有极其深远的普遍性。毛泽东似乎陷入沉思。他说非常遗憾，没有时间去研究科学。但毛泽东仍回忆起年轻时读过的一些科学书籍，如生物学家丁·亚瑟·托马斯的著作，当时他入了迷。”

第二天，在即将回美国的机场上，李政道收到了毛泽东的告别礼物：一套1922年出版的丁·亚瑟·托马斯的原著——《科学概论》。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辩证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他对基本粒子理论的见解就充满了自然辩证法的深刻思想。

毛泽东
风采

1955年1月的一天，科学家李四光和钱三强应邀在中南海向中央领导同志介绍国外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原子能研究的情况。在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向钱三强提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钱三强回答。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毛泽东继续问道。

钱三强回答：“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泽东略加思考，然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哲学预言。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这一预言的正确。就在这一年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人用62亿电子伏能量的质子轰击铜靶，首先发现了反质子；同时，又发现了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

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共产党和工人

党代表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鉴于斯大林因缺乏辩证思想而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在发言中着重讲了矛盾的普遍性问题，主张“关于辩证法需要做广泛的宣传”。在讲解这一思想时，毛泽东以原子为例，说道：“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关于基本粒子的研究动态。1963年秋，一本停刊已经三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了。这是一本发行量并不很大的专业刊物，然而毛泽东翻阅了这本刊物，尤其注意到在这本复刊号上发表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对话》。这年的12月，毛泽东还对前来汇报工作的中央科学小组的聂荣臻、于光远等人特地问起：“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哪里出的？”

1964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北戴河接见几位哲学工作者，又一次谈了他对基本粒子的看法。他说：

毛泽东
风采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雨
来
风
采

毛泽东对基本粒子无限可分性，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不久，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国际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这次会议。8月23日，毛泽东接见了与会的各国科学家。在与坂田昌一握手时，毛泽东亲切地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坂田没有想到毛泽东竟读过他的文章，感到十分惊讶和喜悦。后来，在游览颐和园时，于光远告诉坂田，毛泽东是如何谈到他的文章的。坂田听后很感兴趣，他说：“可惜我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的意见，如果早知道，我的文章一定是要引用的。”坂田回国后，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科学的新风貌》，记载了他和毛泽东见面的情况，以及他对毛泽东重视基本粒子理论问题的一些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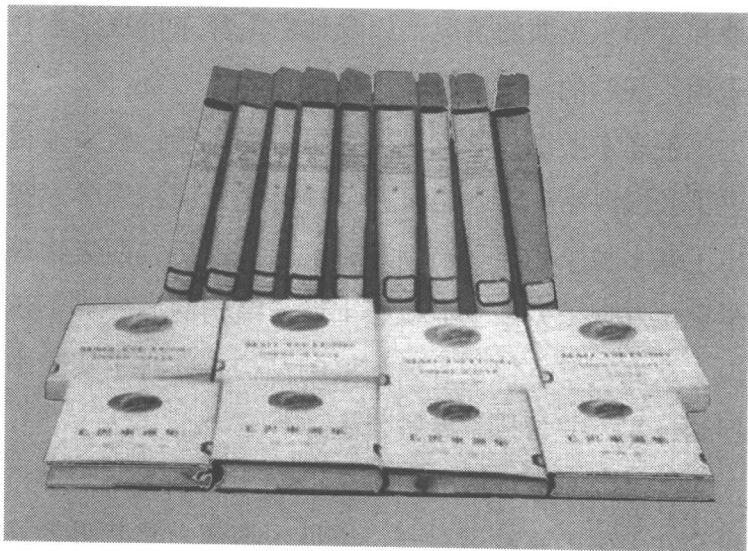
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科学工作者的研究。1966年我国物理学家提出了基本粒子的层子模型理论。在此前后，西方物理学家也发现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从此，基本粒子有更深层的结构，在科学实验中得到证实，并为科学界所公认。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1977年，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在美国的夏威夷召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发表了如下讲话：

毛泽东
风采

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都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统一。

格拉肖的这番话，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给予毛泽东“哲学的最高荣誉”。



毛泽东一生著作甚丰，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主要参考书目

白派

风采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

《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李锐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萧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版。

《青年毛泽东》，高菊村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

《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1月版。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等著，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

《庐山会议实录》，李锐著，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

《毛泽东交往录》，于俊道、李捷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毛泽东读史》，张贻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毛泽东怎样读书》，石玉山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陈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毛泽东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年12—1960年2月）》

《毛泽东（多媒体光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1998年版。

毛泽东
风采

市井
风采

ISBN 7-5011-6403-7



9 787501 164035 >

责任编辑：王 丽

贾允河

封面设计：伍民力

ISBN 7-5011-6403-7/A · 14

定价：16.00 元